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2月15日第5期 总第24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49期

###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27）

#### 目 录

##### 【专稿】

王复兴 从北大文革看“继续革命论”

附录：《武斗赋》（汪延奎）

古 樟 “四月形势图”——北大及北京市两大派分歧的实质

一、第一份材料：《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

二、对“四月形势图”的初步解析

三、第二份材料：《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

四、对第二份材料的初步解析

五、结束语

##### 【评论】

俞小平 事实与逻辑之二——与宫香政同学的再讨论

##### 【述往】

安希孟 凄风苦雨师生情——追忆杨之岭老师

蒋世信 我与北师大——校内校外的混战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血腥武斗（十八）

##### 【资料】

孙蓬一 1967年4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

##### 【读者来信】

1. 向南雷：专业刊物应该有专业性 2. 皮皮侠：红色文化与时俱进

##### 【本刊声明】

【专稿】

## 从北大文革看“继续革命论”

王复兴

### 导言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革中被中共中央及其媒体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集中表述。毛在这个文件的结尾亲自加了一段重要文字：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是在党、政、军中已经篡了权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因此文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命题，本身是个悖论，前提与内容相矛盾、相冲突。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经典含意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指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全面夺取国家政权机构。那么，已经“无产阶级专政”了，已经建立新政权了，还要去革这个政权的命，去推翻它，这不是荒谬绝伦吗？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时，决议起草负责人、党内大左派理论家胡乔木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

有特定的内涵，即无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继续革命论”在文革中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实际中的错误、其危险性、破坏性以及荒谬程度，实如胡乔木先生所言。

正是这一指导理论的谬误，造成人心大乱，天下大乱，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泽东自己也坐困危局之中。上海“一月风暴”后，他曾批判“省无联”提出的“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口号，因为很显然，如果“彻底改善”的话，他本人不是也要被“改善”掉了吗？可是“革命”比“改善”更厉害，于是我们看到：1966、1967年闹革命，到了“一月风暴”，发生“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向走资派的“夺权风暴”。后三年，1968、1969、1970年，又反过来对前两年的“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知青上山下乡”、“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肃清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等一系列运动，旨在压制甚至镇压造反派群众。前两年是革命，后三年对前两年革命的革命。来回大折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公、检、法”被砸烂。出现了打、砸、抢风潮。“公、检、法”属于国家机器。革命既然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那么“砸烂公、检、法”便也顺理成章。1967年夏曾出现全国性的反军高潮，迫使毛泽东发出了“还我长城”的指示——军队是毛恢复秩序依靠的唯一力量了。

1967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翻身掌权的造反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分裂，重新分裂成两派甚至三派，争权夺利，打派仗，直至武斗。不同派别的群众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共同旗帜下，展开全面内战。北大的师生们也陷入了被这种思潮所裹挟、所左右的局面，两派皆然，概莫能外。

## 一、“井冈山”以极左反左

1967年3、4月，当时北大以0363北京公社为代表的反对派，坚持要给校文革、聂元

梓、孙蓬一整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到了6月以后，他们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真理变成了谬误，“整风”变成了“革命”。1967年8月17日，反“校文革”（“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以下不再加引号）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13天之后（1967年8月30日），“井冈山”的小报《新北大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该社论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井冈山”骨干力量的主流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之题目，即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在该文中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消灭中国的反动派”。“井冈山”的《社论》题目采用与毛同样题目，用意很深。他们在《社论》中仿效毛泽东，把“校文革”、“公社”群众视为反动派，要消灭，夺权，“将革命进行到底”。显而易见“井冈山”把1967年8月底的北大看成1948年12月底的中国，他们要仿效毛泽东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北大要“打倒聂孙，全面夺权！”

请看这篇《社论》的表述：

“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北大旧王朝的国家机器并未摧毁。写过‘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根本不是马列主义者，在革命小将推翻了张承先临时政府以后，正是她抹杀和窃取了小将们的丰功伟绩，取张承先而代之，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政权、实则比‘临时政府’更带有欺骗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它网罗与集中了旧北大的一切保守势力，疯狂地扼杀小将的造反精神，完全成了压在成千上万革命群众头上的铁盖子，使北大未能按照主席所揭示的规律去完成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这正是北大运动的症结所在，也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时至今日，他们仍盘踞在北大的各个要害部门，还在固守着资产阶级阵地。……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非彻底砸烂不可！这样的权非夺不可！必须彻底砸烂校文革的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摧垮臭名昭著的新北大公社！”

上述文字很清楚地反映了“井冈山”个别骨干人物的思想，那就是：坚持阶级斗争，继承革命，不断夺权。如《社论》所说要“按照主席所揭示的规律去完成自下而上的夺权

斗争”。陆平的校党委被打倒了，张承先工作组的“临时政府”也被推翻了，但《社论》说聂元梓和校文革仍是“资产阶级政府”，“非彻底砸烂不可”！其观点很符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将其“彻底摧毁”。社论还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号召将这个拥有8000名左右北大师生的群众组织“彻底摧垮”。这里实在看不出什么反聂是“发扬了北大‘科学’与‘民主’的传统”。个别校友这样反思，实在滑稽、可笑！聂元梓打倒陆平，反张承先工作组，到上海串联炮轰上海市委，“一月风暴”中参加高教部夺权，这些够左的了，“井冈山”还嫌其右，说“校文革”是“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二次革命”、“全面夺权”的纲领和口号，这不是更左吗？这不是以极左反左吗？这难道不是反科学、反民主吗？他们明明在当年是被激进的革命思潮所武装、所左右，这当然完全可以理解，这是被当年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们是随大流，赶风潮，是顺文革大潮，并无丝毫的反潮流；但非要把自己说成当年就具有普世价值观，反聂是什么“发扬了北大科学、民主、自由的传统”，这实在可笑！其实质是：美化当年丑陋、落后的意识形态——极左激进思潮！说明自己还没走出文革的阴影，令人惋惜、同情。

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井冈山”有些人早在1967年6月，当孙蓬一在整风会议作完检查之后，“团、零、飘”的一些人就围着他又推又打。7月10日，“团、零、飘”部分人查封了学校保卫组，抢走了档案，又于8月24日打伤了保卫组负责人谢甲林。

7月的一天，“公社”的“六六串联会”由笔者主持，在办出公楼礼堂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自称是“造反派”的牛辉林带领“红旗飘”十几个人冲进会场，牛辉林从笔者手中抢走话筒，然后把笔者推下主席台，并朝笔者胸口踹了一脚，使笔者跌倒在地。

12月底“井冈山”部分人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崑；1968年1月16日，“井冈山”部分人攻打38楼“公社”学生居住室，抢走了三个喇叭。3月29日，“井冈山”武斗队攻占了40楼、32楼，赶走了居住在这两个楼的“公社”同学，把到北大视察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头上打了一个大包，还刺伤了聂元梓，血染衣衫。以上一系列武斗

事件，起码说明北大武斗是两派共同挑起，由小到大，愈演愈烈。“井冈山”个别人把自己说成是当年的弱者，受欺、反抗，而迴避自己当年蛮横逼人、兇巴巴的思想、行为和形象，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不过在武斗后期，“井冈山”人少，确实吃亏较大，因而个别同学可能至今怨气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 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以镇压为能

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派，在1967年至1968年8月，头脑中同样是被极左思潮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样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井冈山”师生，以捍卫校文革是捍卫红色政权自居。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孙蓬一曾强调与“井冈山”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而“路线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坚持要把“井冈山”打垮，甚至亲自指挥武斗（如1968年4月26日指挥攻打被“井冈山”占领的36楼）。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校文革竟然于1968年5月，在两派武装割据、武斗气氛浓厚的形势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校文革成立“清队领导小组”，设立了三个“专案组”，清查“红旗飘”、“东方红”、“北京公社”三个小集团的“坏人”。在“专案组”的审讯中发生了逼、供、信问题，李清崑老师文革后证实确有此等事，他曾奉聂元梓的指示去“专案组”劝说、制止搞逼、供、信。樊立勤同学被打伤、打残，就应发生于此时段。这是违反人权的迫害行为！这是校文革的一件极其严重的罪过。

校文革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干了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两派没有联合，武斗没有结束，在这个时间怎能开展“清队”？此时搞“清队”，只会是“派文革”搞的“派清队”，一派在另一派群众里“清队”。审查时搞逼供信，打人，这完全是错误、不人道的。校文革制止不力，加上无政府主义泛滥，下面不听指挥，因此才发生了伤人至残事件。在群众组织里抓坏人，完全背离了当时中央的清队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校文革的这个派性“清队”，是把对立面群众当阶级敌人打击。这是校文革的一件极其严重的罪错！武斗期间，北大死了三个无辜的生命，这更是聂元梓和校文革不能逃避的责任！

1967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联合”问题的《通知》，指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中央明确指出“大联合”是斗批改（包括清队）的前提。校文革借口市革委会对全市下达了清队的指示，而在没有“大联合”的情况下，一派单方面对另一派搞清队，这是违反了当时中央的政策。何况清理阶级队伍本身就是在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应指出的是，当年的“清队”，没有任何中央文件指示要挖出对立面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校文革以“清队”为名，清查“井冈山”里的“坏人”，这完全是违反政策的派性行为。

### 三、中央文革挑拨，北大两派通病

陈伯达“6·5讲话”，批评聂、孙“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挑动部分群众反对校文革。后来江青又公开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挑动另一部分群众反向斗群众。中央文革一、二号人物先后轮流出面，在两派群众中来回挑拨，目的是什么？是希望天下大乱，是实践毛泽东年初的祝福：祝1967年全国全面内战！

在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是北大最乱的时期，如果说“井冈山”的思潮偏重于受“继续革命”论的影响，要不断革命，反，反，反，一反到底，要不断“砸烂”现存的一切体制的话；那么校文革和“公社”则主要受“全面专政”论的影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对立面，“公社”最流行的口号是：捍卫红色政权。以此为名，对“井冈山”群众实行镇压。

北大两派的派性理论有个共同点：都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北大的派斗，认为与对立派的斗争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视对方为敌人，于是斗个你死我活，誓要分出胜负。这是两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共同之处。两派都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者和执行者。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理论基础。现



在看来，北大的内战是毛泽东信徒之间的内斗，双方都是上当者和受害者。

1967至1968年北大两派的派斗，是路线斗争吗？当然不是！尽管校文革、聂、孙和“公社”的骨干力量当年确曾有过反左意识、反左倾向，反对过吴传启、林杰，抵制过王、关、戚，这当然是正义的正确之举，应充分肯定；而“井冈山”有个别人也确曾受到吴传启、洪涛、林杰、王、关、戚的影响。但这都不足以形成两派师生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美国研究中国文革史的华人学者、社会学博士乔晞华告诉笔者：他曾调查过全国25个省市的文革派性内斗，发现1967年2月以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先后翻身、上台、掌权，成为主流之后，无一例外地全都分裂，出现新的两大派甚至三派，打派仗，直至武斗；到了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8月，运动严重失控，四川两派甚至动枪、动炮、动军舰，但四川并没有王、关、戚插手；也有个别例外的地区，没有发生造反派的分裂，如广西，那是因为造反派“四·二二”始终受压，一直没翻上来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四·二二”派还没来得及分裂就被镇压下去了；这说明当年全国各地的派斗、武斗，有着共同的原因，有着普遍性的共同规律在起作用，这共同的原因，即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文革实践中的必然结果。北大校友在对北大文革史的讨论中，原“井冈山”的重要人物郭罗基老师曾在微信群里对北大派斗提出个见解，指出打派仗是文革中的“通病”。我很赞同郭老师关于“通病”的提法，这个概念很准确，是造反派群众的“通病”。是“病”！由于中央文革的来回挑拨，这“病”愈发严重！

有人说，对北大两派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似乎对自己当年打派仗，武斗，还要肯定百分之几，总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从不对本派做认真的自我批评。方向错了，敌我不分，有什么可肯定、保留的？两派斗争的实质是：争权夺利。为着后文革的利益，展开激烈的夺权与保权的内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对人性的毒害太深了！

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驻北大后，发动群众批判派性，促进大联合。当时两派师生都逐渐放弃了派性，放弃了两派斗争是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谬说，达到了派性斗争是极其荒谬的共识。令人不解的是，事过五十年，两派个别校友，又重拾当年两派的派斗

是路线斗争（即阶级斗争）的谬说，又回到1968年1月至7月的思想状态。

#### 四、“窝里斗”探源：从毛氏理论到传统文化

毛泽东当年批评聂元梓、蒯大富是“头脑发热，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搞武斗。”毛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的理论迷雾导致了全国性的派性斗争。


此外，派性如此普遍、严重，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子中挖掘。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行帮主义、帮派主义、小圈子、党同伐异，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传统。“窝里斗”是中国国民性的顽疾，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暴露。

中国与古希腊不同，不是海洋国家，中国人缺乏向外拓展的眼光，习惯于在黄土地上“坐井观天”，争夺地盘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种“窝里斗”的恶习，至今在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中仍屡见不鲜。

笔者之所以此处反复评论、反思北大两派的打派仗、搞武斗之荒谬。因为至今仍有个别校友，跳不出当年的思维模式。原“公社”有的人说，两派是路线分歧，我是反王关戚的。对上反王关戚当然应肯定，但对下把“井冈山”群众也当做王关戚同党来打击，这就错了。他们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认识而已。“井冈山”有的人说：我是反抗“校文革”暴政，争自由，要民主的。校文革有缺点、错误，应该整风，但把整风演变为革命，打倒、砸烂、夺权，这就错了。这和“民主”、“自由”毫不沾边。

个别校友坚持认为本派正确，对方错误，仍是抓住支流，否认主流。当年（67年2月至68年8月）的主流是，全面内战，混淆敌我，群众内斗。北大两派都无正确可言。北大的派仗、武斗只是全国全面内战的一个缩影。全局决定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对毛而言，其罪责难逃；对历史而言，这是历史逆流，与进步绝缘！文革亲历者、90岁老人汪延奎在《武斗赋》中，对当年全国的派性武斗有着逼真的描绘和深刻解剖。（请见附录）

文化大革命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运动，是个多层次、多线索、各种矛盾相互交叉的运动。但在某个时段必有一个主流，一个主要潮流，一个纲。1967年6月至1968年8月，这个时期无论在全国还是北大，当时的主要潮流，就是：派性泛滥、群众相残、残酷内斗、全面内战！这就是当时的纲。对这段文革史的认知，难道不已是当今史学界和大众的共识了吗？可是北大仍有个别校友的头脑陷在50年前的迷雾中，走不出来！

林彪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观点，当时被群众视为真理而广为传播，对社会的破坏性极大。文革历史告诉我们：人民也会犯错。

2019年元月元日

附录：

## 《武斗赋》

汪延奎

作者序：文革之第二年，造反派转入夺权阶段，各地皆形成二派，势不两立。“旗手”号召文攻武卫，领袖挑起全面内战，命军队介入“支左”，武斗兴焉。

应导师号召兮，群雄蜂起；各路造反派兮，多如牛毛。打倒刘邓兮，争夺权力；形成两派兮，互比低高。咸打毛泽东旗号兮，不管哪派；为保卫伟大领袖兮，何惜命凋。皆谓己之正确兮，对方反动；各称最为革命兮，别人是妖。先是口战兮，大念《语录》；互不相下兮，拳脚代劳。再度升级兮，砖头石块；进而搏命兮，梭标长矛。成群结队兮，耀威扬武；聚伙千百兮，英雄天骄。各组兵团兮，选出司令；自命不凡兮，卫霍萧曹。正当此际兮，圣主发令；军队支左兮，推向高潮。认定左派兮，发给枪炮；对方不服兮，抢军筑巢。烽烟战火兮，全国大乱；无辜百姓兮，心悴魂销。


最烈者可举二处：重庆武汉。重庆两军对垒，动用大炮坦克，战斗经年，死亡数千。双方死者都称烈士，现有陵园。武汉百万雄师，震动最高端，王力被打，领袖亲至，害怕

放火自焚，潜乘飞机逃还。其他各处，莫不战火纷飞，血迹斑斑。

枪子炮弹飞来急，前线生死在一息。昔日同窗成仇敌，旧之师生被囚繫。美貌女郎中弹卒，青年学子矛穿肋。虐待战俘肆拳踢，滥动私刑狠毒极。铁丝贯胛驱水溺，剖心割肝烹而吃。鲜活生命无故死，伤心惨目不忍述。

如何有此深仇大恨，生者不知，死者未悉。临终犹以为，忠于主席，忠于革命，丹心红赤。其能生还，或是凶手；后来治罪，多付刑辟。父母失子女，陨命由自择。

曲终人散，迷雾累累；冷静思考，真相渐白。打仗相拼，全是受骗；一人施术，万众血滴。为人利用，徒工具耳；运动群众，弄权窃国。阶级邪说，害人非浅；煮豆燃箕，生灵号泣。宣传鼓动兮仇恨生，挑起互残兮斗蟋蟀。

武斗历一年有余，死伤坐牢者以数十万计，一事无成，懵然而夭。经几十载，未还公道，彼操纵者，仍尊舜尧！

【专稿】

## “四月形势图”

### ——北大及北京市两大派分歧的实质

古 樟

1967年8月25日和26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汇报内容同王力、关锋的问题有关。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sup>1</sup>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王力、关锋自8月30日起被隔离审查，4个月后被投入秦城监狱；戚本禹则于1968年1月12日被隔离审查，直接被送进秦城监狱。

<sup>1</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六卷，第113—114页。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sup>1</sup>

实际上，王、关、戚及其同伙的问题早已暴露，并受到了许多群众的反对和抵制。但是，由于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要员，占据着政治制高点，炙手可热，红极一时。其同伙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拉大旗，作虎皮”，党同伐异，不可一世。因而，同王、关、戚及其同伙的斗争成了风险极大的事情。这也是文革中一场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北京市许许多多群众组织都卷入其中。北京大学校文革负责人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较早地看出了王、关、戚、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斗争。但也有一些人自觉地、不自觉地站到王、关、戚及其同伙一边，分歧可谓泾渭分明。

本文展示两份当年的油印材料，并对其作一些说明和分析。一份材料题为《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署明日期是1967年6月15日；另一份材料题为《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第二份材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里提到了图，但文中无图，也没有署明日期。笔者拿到它时，是和上一份材料放在一起的。这两份材料似乎是有分工的，前者负责公布“材料”，后者在前者公布的“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因此，可以认为它们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写成的，共用一张图（见附图）。这两篇材料见证了当年北大及北京市两大派分歧的实质，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 一 第一份材料：《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

第一份材料全文如下：

### 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

北京公社 07 红彤彤 战地黄花

公布者按：

《四月形势图》是一幅触目惊心的黑图！

---

<sup>1</sup> 出处同上，第417页。

《四月形势图》是孙蓬一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四月形势图》是孙蓬一分裂中央文革的罪恶铁证！

图是《新北大》编辑部的一位编辑绘的，但分析“形势”，制定“战略部署”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孙蓬一！

孙蓬一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在校内、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蓬一自称“江青派”，公然分裂中央文革，直到最近还派人到北京图书馆大整关锋同志的黑材料。

孙蓬一炮打谢富治副总理，极力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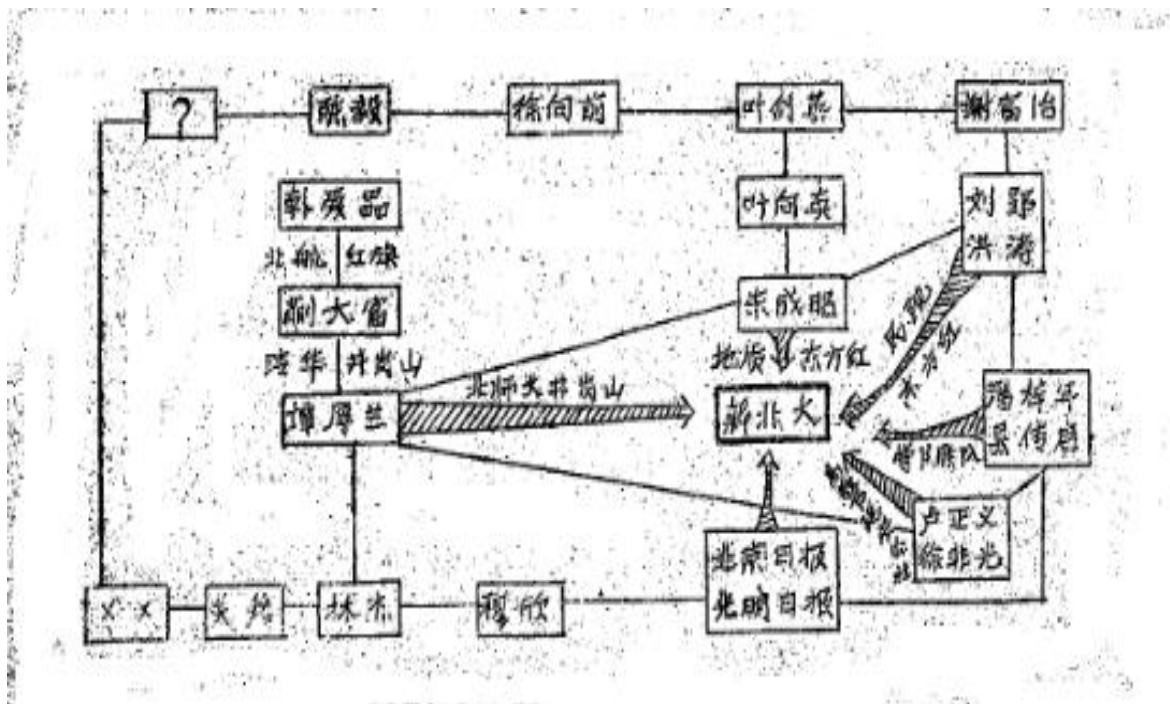
孙蓬一竟然狗胆包天，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康生同志，把总理和康老看成是“反新北大逆流”的总后台。

联系到聂元梓说的“还会有新的黑线”，要揪什么“赫鲁晓夫阴谋家”，联系到聂元梓居然组织人力批判《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此件由王力、关锋同志起草，总理修改定稿），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们严正警告孙蓬一，你必须老实交待你攻击总理和康老的一切罪行！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孙蓬一休自寻绝路！

下面就是孙蓬一的“四月形势图”：



说明：

1. 此图是孙蓬一四月十四日夜（引者注：应该是四月十三日夜或十四日凌晨）炮打谢富治同志之后，大批人马云集南校门准备去冲公安部之前，由《新北大》校刊编辑吴××对本班同学分析形势时绘制的。现在我们根据追忆，复制如上。

2. 当时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未支持孙蓬一，故亦被列入“反新北大逆流”。

3. 双线箭头表示对新北大的进攻，单线表示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

## 二 对“四月形势图”的初步解析

### 所谓“四月形势图”的由来和影响

上文中的吴××即吴子勇，是中文系62级学生，当时是校刊《新北大》的一名编辑。吴子勇毕业后进入军队工作，现已退休。2018年10月底有校友联系到他时，他告诉该校

友：“当时在宿舍里和几个同学谈形势，随手拿桌子上的传单，在背面画了一张图，具体的细节已记不清了。”

从上文末尾的“说明”来看，文章的作者就是吴子勇的同班同学，被拿来大做文章的“四月形势图”，也就是文章中的附图，并非吴子勇的原作，也不是按照原作复制的，是文章作者两个月后根据追忆复制的，其准确性不无疑问。吴子勇当时分析形势，是在宿舍里对同班同学讲的，不是正式场合，更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其中颇有道听途说、主观臆测的地方。但他绝对想不到，在陈伯达 1967 年 6 月 5 日讲话之后，同学中会有人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把所谓的“四月形势图”转嫁到孙蓬一头上，再以种种罪名大加讨伐。

其实，4 月 14 日，在北大南校门内马路边的苇蓆棚上已经贴出了一张图，标题为《吴子勇的四月形势图》，是在两张大字报纸上画的，除标题外，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从标题上看，这张图并不是吴子勇自己画的，而是其同学中的好事者把它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的。据见过这张图的校友说，当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大字报的图上写有关锋的名字，并用线条将关锋和××连结起来。在当时的北大，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尽管聂元梓和孙蓬一在 4 月 10 日面见江青、陈伯达时，当面提出了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问题，但在大字报上点关锋的名字，还是不可以的，更不要说影射康生了。吴子勇说话不慎，以致校园里出现了《吴子勇的四月形势图》这样的大字报，并且是校园里唯一一份点关锋名字的文字材料。对此，校文革保卫组加以过问，是其职责所在。

1967 年 7 月 10 日，北京公社一些人利用陈伯达的讲话，打砸了保卫组，将一应材料抢劫一空。1967 年 7 月 26 日《新北大报》（第二号）刊出题为《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他们对反革命‘四月形势图’（该图恶毒地把谢富治、关锋、林杰、穆欣等同志和师大井冈山、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列入所谓的‘反新北大逆流’并刻毒影射康生、周总理）的炮制者，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吴子勇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黑二组的一份对吴子勇的处理意见：‘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撤销新北大编辑部编辑的职务。妥否？请批示。’”



这篇文章只公布了所谓的“处理意见”（其真实性另当别论），却没有公布相关文件的全文，没有说明二组提出“处理意见”的时间和依据，为什么呢？是文章作者有什么忌讳吗？还是这份文件已经被送往某处报功去了，不在作者手头？

“四月形势图”确实被报告到了高层，并受到康生的重视。

1967年9月16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北京“天派”时，康生说：“北大有出了个系统表说我是林杰关锋的后台。周总理就是另外一派，陈毅、谭震林的后台，有书为证嘛！不是造谣嘛！”康生所说，显然就是指“四月形势图”。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公社某些人公布的所谓“四月形势图”，其中并没有谭震林的名字，康生为什么要说“周总理就是另外一派，陈毅、谭震林的后台”呢？康生说“不是造谣”，那么是谁在造谣？康生看到了什么样的报告呢？见到了什么样的“系统表”呢？材料是谁上报的？什么时候上报的？谭震林的名字又是谁加进去的？用心何在？

### 为响应陈伯达 6.5 讲话，《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出炉

我们再看看上引第一份材料出炉的时间——1967年6月15日，正是在陈伯达 6.5 讲话的十天之后。陈伯达 6.5 讲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压、阻止新北大公社对吴传启一伙的揭露。5月27日，陈伯达、关锋、王力召见聂元梓，要求不要公布吴传启的材料，遭到聂元梓的拒绝，除隐患战斗队在6月1日公布了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于是陈伯达、关锋一伙气急败坏了，愤怒了，急不可耐地要出手镇压了，于是陈伯达 6.5 讲话出笼了。

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北京公社中文系的某些人觉得机会来了，可以把两个月前的事情拿出来大做文章了，于是这份材料就出炉了。

“按语”指责孙蓬一派人到北京图书馆整关锋的黑材料，据笔者所知，这完全是按语作者的凭空想象。关锋的材料不需要整，更不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整。对关锋的看法，聂元梓、孙蓬一4月10日就向江青、陈伯达当面说过了。聂、孙这次进言的主要内容，孙蓬一在4.12讲话中已经公诸于众了。关锋、吴传启一伙结党营私的材料，到北京图书馆去是

查不到的，但广大群众有目共睹。对这个团伙侧目而视的大有人在，新北大公社并不是在孤军作战。

需要整的是吴传启的材料，尤其是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调查吴传启不需要去北京图书馆，需要去的是武汉档案馆。这项调查，在1967年5月就已经完成了。

“按语”指责孙蓬一炮打谢富治，极力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威信。其实，**破坏北京市革委会威信的是谢富治自己**。堂堂上将、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竟然把自己变成了王、关、戚的小伙计，在群众中拉一派，打一派，在市革委会内任由周景芳把持一切，排斥吴德等人，从而把市革委会变成了被王、关、戚、吴传启一伙操控的地方。吴德晚年的回忆录揭示，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重要岗位，都被学部联队的人甚至吴传启所把持。而且，毛泽东也明白，“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sup>1</sup>

“按语”指责聂元梓组织人力批判《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但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指明是哪篇文章，“按语”作者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吗？按语还说这篇评论员文章由王力、关锋起草，总理修改定稿，《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起草和修改定稿的内幕，“按语”作者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他们的？

### 略论重画的“四月形势图”

鉴于油印材料的制作者已经声明，这张图并不是吴子勇的原图，是他们根据追忆复制的，复制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吴子勇当时的看法，是有疑问的。笔者现在只能就上面这张图来讨论。

文章作者在图下的“说明”中称，“双线箭头表示对新北大的进攻”，这些“进攻”现在应该理解为矛盾和冲突。它们不是同时发生的，最早的是2月2日高教部事件，而后是4.8民族宫事件和4.11地质等6校来北大闹事。“双线箭头”有六个之多。谭厚兰是听

<sup>1</sup>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611页。

命于林杰的，学部联队吴传启是关锋的密友（潘梓年仅是摆样子的“牌位”）。洪涛是学部下属民族研究所的干部、学部联队的头头，刘郢是统战部的干部，他们都是听命于吴传启的，并且控制着民委统战系统“红色联络站”的一派群众组织。卢正义因为在高教部贴第一张大字报而出名，但他的历史问题极为敏感，以至于关锋一伙不仅要挑动北师大井冈山同北大武斗，关锋、王力还要亲自出面对北大进行打压——这也就暴露了他们自己。至于地质东方红，其实只是该组织中一部分同洪涛、刘郢有联系的人，受到洪涛等人的挑动，被洪涛利用而已。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 4.12 讲话讲得很清楚：“**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 4.8 民族宫事件在现场指挥的，就是洪涛（这是洪涛自己交待的）。

图中提到的朱成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原是地质东方红的头头，大概因为同中央文革大佬们接触很多，看透了他们的本质，变成了激烈批评中央文革的人。于是，朱成昭立即被中央文革抛弃，1967年2月4日就下台了。朱成昭和叶向真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地质东方红内部这个派那个派的事情，笔者当年并不了解，数十年后读到《王大宾回忆录》，才知道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朱成昭曾经支持北大的“反聂派”，但那是早先的事。1967年4.8民族宫事件发生时，朱成昭早已下台，北大不清楚对方内部的情形，只好笼统地用“朱成昭势力”来指称。半个世纪后，《王大宾回忆录》说：“有部分人违背我们‘外单位的事，我们搞不清楚，不要参与干涉’的正确决定，干涉外单位的活动，要为自己支持的一派出头，自认为真理在我。我为地院主要负责人，不能妥善处理摆平事件，是我的无能，是我的错。”<sup>1</sup>王大宾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笔者以为大可不必。笔者不想追究谁的责任，倒是很想知道“有部分人”当时是听谁指挥的。

图中由朱成昭、叶向真引向叶剑英的线，似乎说叶剑英通过叶向真、朱成昭反对北大，这没有事实依据，纯属臆测。把这条线引向别的老师，更是无稽之谈。北大内部的文革运动，同老师们毫无关系。新北大公社发起反吴传启的活动，同老师们也没有关系。军队高

<sup>1</sup>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130页。

层和中央文革之间的矛盾斗争，北大师生是不可能知道的。图中左上角标有一个“？”，“？”的意思就是存在疑问，这同左下角标示的“××”完全不同，后者一望而知是指康生，“？”却无法解释。这条线和这个“？”，反映了说者（如果确实这样分析过）对形势的认知有很大的混乱之处。至于说“？”是暗指周恩来的说法，是解释者毫无根据的臆想，因为图中完全没有国务院系统。

1967年3月7日，在中央文革的幕后策划下，学部联队、北师大井冈山、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院919、新人大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发起大规模“反二月逆流”的行动，要打倒谭震林、余秋里、李先念、陈毅等几位副总理，洪涛、刘郅贴了李富春的大字报，<sup>1</sup>最终的矛头所向，已经指向了周总理。这一行动来势凶猛，而且显示出他们是大有来头的。形势严峻，压力巨大，新北大公社不得不声明“打倒谭震林”并成为“炮轰派”的一员，但实际上保持着极大的警惕，当发现有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时，新北大公社表示了坚决保卫周总理的态度。（红代会驻东郊联络站负责人、北京机械学院的许维刚就对北大同学说：“你们北大这一次站错了队，你们站在总理的一边。”）在“反二月逆流”的狂飙中，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有着明确的、慎重的态度，由此被校内外的反对者骂作“二月逆流派”。<sup>2</sup>新北大公社哪里有资格当“二月逆流派”！不过是为周恩来和几位管理经济、外交的副总理打抱不平而已。而且，北大有许多人清清楚楚地看出了，在这场“反二月逆流”的狂飙中，是有利益团伙在混水摸鱼的。很快，新北大公社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团伙。

1967年4月8日，以新北大公社、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民族宫“二七兵团”等组织为一方，与民族学院东方红、统战民委系统的红色联络站、地质东方红等为另一方，为争夺在民族宫的民族工作展览的批判权，在民委大院（民族宫的后面）发生冲突。事后双方都

<sup>1</sup> 洪涛、刘郅以个人名义贴了李富春的大字报后，立即遭到新北大公社的反击。谭厚兰后来说：“反二月逆流时，吴传启来到了我们学校，说他们掌握了李富春同志很多材料，他们要先搞谷牧、薛暮桥，然后再搞李富春。”参见谭厚兰1967年11月15日晚在北师大“斗私批修”讲用会上作的检查，该检查题为《斗私批修，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下简称“谭厚兰的检查”。该材料收入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481—493页。

<sup>2</sup> 毛泽东后来亲自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六卷，第417页。

发表声明，签名的单位各有30多家。北航红旗在4.8民族宫事件中表示中立。“4.11事件”发生时，清华井冈山一个头头跑到北大，公开指责北大，被北大同学教训了一下，清华井冈山总部为此发表了一个谴责北大的声明。北师大井冈山于4月13日发表声明，声称4.11、4.12事件同他们无关（遗憾的是，笔者数十年后才在《记忆》第150期上看到这份声明，当时完全不知道）。另外，1966年10月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地质东方红和清华井冈山都曾支持他们（1966年的北大井冈山自称是清华井冈山的一个支队）。上图说清华和北航反对北大，事出有因（但在笔者印象中，北航同北大并没有发生过什么过节），但将清华、北航同北师大连在一起，没有道理。<sup>1</sup>在清华和北航的问题上，孙蓬一的4.12讲话讲得很清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在某个问题上，跟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还是我们的战友，这里，我再一次表示我的看法，像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应当和他们一起战斗！”实际上，到1967年5月，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等好几个群众组织，已经同新北大公社站在一起向吴传启团伙发起了进攻。上述材料在6月中旬问世时，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

有的单线是符合实际的，如谭厚兰同卢正义之间确实有“密切联系”，关锋、林杰、穆欣、《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卢正义、吴传启、洪涛、刘郢、谢富治这条线也是存在的。实际上，关锋（还有戚本禹）和谢富治之间还应该有一条线才对。但是，把谢富治和老师们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1967年春，几位副总理（谢富治除外）和老师同中央文革正处在对立之中，而谢富治是坚决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的。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谢富治表现得非常积极，其他副总理和几个老师都是被打倒被炮轰的，谢富治和老师之间何来“密切联系”？

### 三 第二份材料：《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

<sup>1</sup> 据谭厚兰说，在《北京日报》夺权问题上，北师大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发生过矛盾，由于林杰公开讲话支持一方，打击一方，北师大井冈山有恃无恐，“从此双方伤了感情，一直存在着隔阂”。参见“谭厚兰的检查”。

第二份材料全文如下：

### 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

#### ——北京公社“小人物”

##### （一）辩证法讲师与辩证法讲师的得意门徒

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被揭发出来了。

这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大黑图，它疯狂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中央常委、市革委会机关报《北京日报》以及许多革命派组织，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

《四月形势图》是孙蓬一等人分裂中央文革的铁证！

《四月形势图》是孙蓬一等人向工农夺权的野心大暴露。

《四月形势图》的出土，使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大开眼界，幡然醒悟，更加看破了孙蓬一的真面目。

《四月形势图》的出土，使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总部头头以及其他一些“要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迭迭叫苦。埋怨该死的吴子勇泄露了天机。

吴子勇，这个可怜的小丑，孙蓬一的牺牲品，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连连抛出了三个“声明”，说什么“《四月形势图》的全部错误及其引起的恶劣后果，由我负完全责任，与任何人无关”。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充分暴露了吴子勇们心里的无限惊慌和政治上的极度空虚。

微不足道的吴子勇，能给出如此精制，如此完善的形势图吗？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的编辑老爷，怎么能“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吴子勇一方面说：“四月形势图是根据当时流言蜚语画出来的。”一方面又说“与任何人无关”，这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吴子勇们已经惊慌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了，吴子勇的所谓“流言”从何而来，这难道还用得着说吗？

事情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晚上深夜，孙蓬一到展览馆，煽阴风，点鬼火，大放厥词，说什么“北京就是有摘桃派，师大井冈山、吴传启就是有后台。”并用桌子上的物品排成了形势图，和触目惊心的《四月形势图》大同小异。

孙蓬一和吴子勇到底是什么关系？《形势图》的发明权到底归谁？是一方窃取了另一方的“研究成果”，还是“英雄所见略同”？

答案是很清楚的：孙蓬一是辩证法讲师，吴子勇是辩证法讲师的得意门徒。

## （二）《四月形势图》的形成的历史过程。

《四月形势图》的出现决非吴子勇一时灵感创造出来的，它是孙蓬一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它开始形成于一月份，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加工改造完成于四月份，成了他们向工农夺权的指导思想。吴子勇这个小丑只不过是将其表现于纸上而已。

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事实胜于雄辩，谎言的制造者必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一月份，北大到处抢权，在高教部与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发生冲突，受到关锋、王力同志严厉批评。在中宣部北大支持阮铭伙同一个什么首都职工革命造反兵团夺红旗杂志的权，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又一次受到陈伯达同志、关锋、王力同志严厉的批评。

首长的批评使孙蓬一之流大为恼火，开始发牢骚：“关锋就是关锋，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他正确的我们就听，不正确就不听。”聂元梓故作镇静地说：“同学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向中央反映。”聂元梓对关锋、林杰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大为不满，曾狂妄地说：“关锋、林杰是立场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待查。”

康生同志去年八月就说过徐非光不是叛徒。一月份关锋同志也指出徐不是叛徒，但孙蓬一暴跳如雷，说：“徐非光就是叛徒，我们新北大革命派最有发言权，我们掌握的材料，关锋不一定掌握。”孙蓬一还气急坏地叫嚷：“北大社教中有两个叛徒，一个是常溪萍，一个是徐非光。常溪萍我们搞臭了，徐非光就是搞不臭，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谁在搞

鬼？”孙蓬一明目张胆地污蔑关锋、康生包庇叛徒，不是很清楚吗？

自从一月份夺权以后，孙蓬一就将北京各组织分成两大派，将与北大持有不同意见的组织统统打入“反新北大逆流”。1月31日《新北大》校刊就有“粉碎反新北大逆流”等文章，说什么“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同志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北大本来是支持学部联队的，可是这以后凡有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等参加的活动，北大都不参加，拉开了两大派内战的阵势。

动态报一月底就开始探索两派斗争的“秘密”，二月十五日的动态报攻击“谭厚兰已不是革命左派了”“井冈山公社已蜕变为修正主义的了。”并经常与师大造反兵团联系，甚至公开支持他们，孙蓬一的特务机关——动态组的高级《内部参考》第十期最明白不过地作了说明，他公然骂道：“师大井冈山所以如此嚣张，就是因为有关锋、林杰做他们的后台，关锋、林杰支持它。”

对地院东方红、民委的洪涛、刘郢等人的研究也成了重要课题。1月15日《红色联络站》洪涛等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谢富治同志处理了此事，将洪涛放了，且肯定他是左派，而将民院抗大郑仲宾拘留了十五天。二月份谢富治同志处理了《北京日报》问题，北大意见甚大，这样北大就怀疑谢富治是学部联队的后台，并开始与民院抗大打得火热。

当时动态组常常有人提起“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有一只大老虎”。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指关锋同志。动态组每天晚上碰头，研究的大都是这条“又黑又长的黑线”并把这些情况向孙蓬一汇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四月形势图》下一条黑线还有北京日报。北大攻击《北京日报》由来已久，早在一月份夺权中，北大就和北航等组织一起夺了《北京日报》的权，违背中央指示，提出什么“打倒编辑老爷”的错误口号，贩卖工团主义，把报社的造反派甩在一边。聂元梓同志在第一期就发表了一株矛头指向造反派的大毒草，第一期出版后，中央文革江青、戚本禹同志要他们停刊，并退出“北京日报”，说：“《北京日报》给你们办死了，第一期就死了



一半。”北航等组织不退，以后实行军管，从此北大便和《北京日报》结下怨仇。

这就是《四月形势图》形成的过程，一桩桩、一件件摆在面前，赖也赖不掉，孙蓬一的“一时冲动论”休想再欺骗革命造反派。

（三）孙蓬一的四.一二、四.一三讲话就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四月形势图》。

要想看懂《四月形势图》，只要重读一遍老孙有名的四.一二、四.一三讲话就行。吴子勇绘出的《四月形势图》不过是老孙讲话的提炼及形象化罢了，它实际上是北大一些决策人物和一些要员的指导思想。王茂湘就曾评说过：“老孙十二日讲话的精神是大部分常委同意的。”

现在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个臭名远扬的讲话吧。

讲话首先攻击地院东方红，说它“靠打砸抢起家”“历史丑恶得很”，充当了进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是“朱成昭势力”，这与《四月形势图》完全一样。

4.11 师大没参加武斗，但在四.一三讲话中，孙蓬一富有煽动地攻击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这就是为什么《四月形势图》师大后面有北航和清华。

接着孙大圣提出摘桃派理论，点了潘梓年、吴传启、卢正义、徐非光、刘郢、洪涛、周景芳等人的名。不点名地攻击关锋、林杰、谢富治，说这些人组成了北京“最大的摘桃派”，这与《四月形势图》也完全相同。

孙蓬一的讲话就一月十五日档案事件大发议论，说：“抢档案的人成了革命派，而制止抢档案的人却成了反革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绝对不能做奴隶主义，绝对不能盲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勾结在一起，凑成了现在北京市存在的最大下山摘桃派。”这里，孙蓬一污蔑谢副总理是最大的下山摘桃派，并认为他是洪涛、刘郢的后台，这与“四月形势图”一模一样。

孙蓬一的讲话对光明日报大搞政治陷害，放肆攻击光明日报也是“四月形势图”所包括的。

孙蓬一组织了“报刊分析组”，校刊曾奉命登文章攻击《北京日报》，所以吴子勇的黑图，当然少不了这一条。

孙蓬一讲话影射关锋，攻击他和吴传启一起写文章“像演戏一样”，这也是四月黑图的一个内容。

黑图的左下角的××是谁呢？就是曾给聂元梓等人最大支持的康生同志。一月份北大在康老问题上态度很暧昧，据说聂元梓当时还亲自到清华向刘泉要康老的材料。×××还利用北大社教有关问题整康老材料，伯达批评北大说：“康老、王力是坚决与彭真作斗争的。”

4.11以后动态报有人说：“清华过去有人搞康老，一是从上边搞，往下追，那样就搞错了，这次他们从下边搞起来。”

5月27日座谈会上有同学讲到，外面传说林杰、王力支持清华414，聂元梓点点头。当有同学说，据说四一四里有康生的养子，聂元梓吃惊地问：“什么？什么？康生的养子，叫什么名字。”孙蓬一则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斗争就是这样复杂。”联系陈伯达同志批评孙蓬一等人翻脸不认人，联系外界流传北大保陶反康，吴子勇在黑图里，关锋前面打上××以示康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四月黑图，上面一条线为什么有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呢？不是有不少人问：“为什么有人把矛头指向沙家浜，<sup>1</sup>其后台是谁吗？”形势图作了回答。

孙蓬一讲话后，北大一同学写信给上海军医大学的信明确指出：“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以穆欣、关锋、林杰、叶剑英等人为首罗网了高校地院等组织，企图砍掉聂元梓……”“对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我们就是要炮打，特别是叶剑英，在这次逆流中充当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这封信说出孙蓬一“想说而没敢说的话”。

至于四月形势图上的？是谁，留给吴子勇自己回答。

---

<sup>1</sup> 1967年4月地质学院东方红一些人到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与其中的一派发生肢体冲突。见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

孙蓬一讲话的客观效果，也足以证明他们的讲话就是地地道道的“四月形势图”。

孙讲话以后孙的嫡系红一团召开一个《关于关锋问题》的串连会，大整关锋的黑材料。孙的嫡系部队06“缚苍龙”战斗队起草了“炮打关锋”的大字报。桔子皮也写了一张“二十问关锋”的大字报，只因慑于形势，未敢抛出。

十四日，孙之嫡系《捉鬼队》成员历史系××与地院同学座谈又是一篇“四月形势图”。

上面提到的北大×××给上海军医大学××的信，上海等地成为爆炸新闻，这更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四月形势图”。

它说明4.11以来，北大校园内笼罩着一股分裂中央文革、分裂市革委会的阴影，四月形势图几乎控制了北大的舆论。

铁一般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孙蓬一的讲话就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四月形势图》。

吴子勇必须交出后台，舍车马保将帅，行“苦肉缓兵”计决无好下场！

孙蓬一向真理投降是可以的，耍赖是不行的。

#### （四）《四月形势图》的实践与破产

四月十四日中央文革批评北大后，孙蓬一等人拒不接受批评，变本加厉地按四月形势图一意孤行，大搞政治赌博，把他的政治生命全部押这一宝上。

1) 继续攻击地院东方红，说他们“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说什么“由于我们的错误，延长了地院的寿命。”“敌人的成功是建立在我们的错误之上的。”“反新北大是朱成昭势力”等等，这还不是“四月形势图”？

2) 继续攻击师大井冈山，校园里出现不少这方面大字报。《内部参考》更是肆无忌惮地攻击师大和关锋、林杰。

3) 攻击关锋同志，继续分裂中央文革。孙蓬一歇斯底里地炮打谢富治以后，受到中央批评，有人问他：听说陈伯达同志讲聂元梓讲话很不象样？孙狂叫道：“我看陈伯达同志是不可能这样说的，如果真有的话，那肯定是关锋说的。”并且煽动不明真相的同学去质

问关锋同志，他对历史系同学说：“你们可以以个人名义给关锋同志写信，让他表态。你们就说，关锋同志，现在学部联队吴传启拿着你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影响很不好。我不知道你和吴传启的关系，请你表态好吗？”他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就这样写也没什么关系，你们是学生嘛，你们不了解情况嘛！”企图重演4.14的丑剧，给关锋同志施加压力。手段何其阴险、毒辣。

红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聂元梓同志却要批判，说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炮打中央文革，分裂中央文革吗？

4) 攻击林杰。5月27日秘密座谈会上，有同志提到林杰，聂元梓说：“不管是谁，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批判”。前几天，66串联会头头×××还说：陈伯达说北航红旗不要被坏人利用，这个坏人就是林杰。

5) 借揪潘吴把矛头指向学部联队和市革委会，提出“打倒吴传启，揪出周景芳”“要从市革委会揪出一批投机分子来！”六一庆祝会原计划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后在市革委会以70:3被否决，只好改在运动场召开。孙蓬一公然讲：原准备在天安门开，因阻力比较大，只好改在这里。

6) 攻击《北京日报》。5月3日，聂元梓对我校驻文艺口人员说：“别的单位，组织，观点和我们一致，走在前头很好嘛！我们不一定抢头，这对整个斗争有好处。北航写了《北京日报》近来为谁说话？我们不写又有什么不可以？……”孙蓬一、李士昆、姜同光等人还亲自指挥广播北航红旗恶毒攻击北京日报的文章，并准备在校刊上登自己的文章攻击北京日报。在此之前，校园内批判北京日报社论《打倒彭真》的大字报达几十份之多。

7) 攻击光明日报。校刊曾多次向历史系遵义战斗队索取攻击光明日报的手稿，哲学系批刘邓中心组曾二次接受任务攻击光明日报，直到伯达同志批评之后，一篇攻击光明日报的稿子还在修改中。

以上种种事实不都是四月形势图的实践吗？而且比四月形势图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宣判了“四月形势图”的死刑，把孙蓬一几个月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创造出来的伟大成果抛进了历史垃圾堆，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宣告孙蓬一之流几个月来狂热的政治赌博，连老本都输个精光！

\*

\*

\*

四月形势图的出笼，毫不奇怪，他是孙蓬一之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它帮助我们理解孙蓬一之流的内外政策有极大的帮助。

孙蓬一就是《四月形势图》的炮制者。

让那些为孙蓬一唱赞歌的人在事实面前发抖吧

北京公社 小人物

## 四 对第二份材料的初步解析

### “小人物”的文章道出了北大两派分歧的实质

这是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响应陈伯达的6.5讲话，不辞辛苦，搜集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材料，好似一份“聂、孙反关锋罪行录”。其目的只有一个，为陈伯达的6.5讲话做出注解，提供“证据”，同时，又利用陈伯达的6.5讲话，说明聂元梓、孙蓬一罪行累累，罪不可赦。在作者笔下，聂、孙的罪行有“分裂中央文革”、“向工农夺权”、“污蔑关锋、康生包庇叛徒”、“影射关锋，攻击他和吴传启一起写文章‘像演戏一样’”、“攻击关锋、林杰、吴传启、潘梓年、卢正义、洪涛、刘郢、周景芳等人组成了北京‘最大的摘桃派’”，聂、孙还攻击《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等等，等等，总之是罪大恶极。

“小人物”文章的价值，在于其道出了北大两派分歧的实质（尽管有些地方还不确切），清楚而坚决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按照这篇文章例举的事实和逻辑，聂元梓、孙蓬一的问题，并不是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聂元梓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而是“分裂中央文革”的问题，是“攻击关锋、林杰、吴传启、潘梓年、卢正义、洪涛、刘郢、周景芳等人组成了

北京“最大的摘桃派”的问题，这当然是性质非常严重的原则问题。但这么一来，也表明了“小人物”自己的立场。原来，“小人物”是完全站在关锋、林杰、吴传启、潘梓年、卢正义、洪涛、刘郢、周景芳这些人一边，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辩护的。这才是分歧的实质。

对于研究北大文革历史而言，“小人物”的文章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

### 关于“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小人物”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动态组常常有人提起‘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有一只大老虎’。他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指关锋同志。动态组每天晚上碰头，研究的大都是这条‘又黑又长的黑线’并把这些情况向孙蓬一汇报，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所谓“动态组”，是物理系几位同学在1966年底自发创立的，办一份油印的《动态报》，很受同学欢迎。笔者当年和动态组的同学多有接触，就缘于《动态报》。笔者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有关那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的信息，听到他们精辟的分析，这是至今仍要感激他们的。“小人物”的这段话基本属实。这一情况的提供者，显然就是原《动态报》编辑部的成员。动态组的许多同学都很正直、理性，不极端，头脑比较清醒，看问题实事求是，不追风，不盲从，所以能看出问题来，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同时他们又很谨慎，议论时从不提关锋的名字，大家心中有数，根本不需要提“关锋”二字，那怕一个“关”字都不用提，所以揭发者也举不出动态组有任何点名议论关锋的事实。陈伯达的6.5讲话是对人的考验。在高压之下，包括动态组多数成员在内的许多同学，仍然坚持正确的观点，毫不动摇，因为这样的观点是从实际调查中得来的，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当然，随风转向的人也是有的。上面提到的这位揭发者在陈伯达6.5讲话的高压和蛊惑下，他动摇了，立场和观点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否定了自己，转过身对曾经的同伴进行揭发了。不过笔者也看到，他没有编造假话来诬陷《动态报》的其他人，还算良心未泯。

### 所谓“整了关锋的材料”

“小人物”们很想找到什么“铁证”，证明聂、孙整了关锋的材料，可以像吴传启一伙整垮对立派一样，将聂、孙一举整垮，但他们一无所获，只能用“四月形势图”和某些墙头草的“揭发”来拼凑，但这有用吗？他们口口声声说“《内部参考》更是肆无忌惮地攻击师大和关锋、林杰”，有证据吗？他们指称红一团和“缚苍龙”等战斗队整了关锋的材料，甚至写好了大字报，但这有证据吗？这些事都是真的吗？如果这是假的，那就是“小人物”在捕风捉影，凭空捏造。如果这是真的，新北大公社居然有好几个战斗队掌握了关锋的材料，还写了大字报，那只能说明，关锋的问题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了，整关锋材料写关锋大字报的同学太勇敢、太了不起了。

### 所谓“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

陈伯达在6.5讲话中以无产阶级自居，指责聂、孙“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非常重的话。实际上，利用文革“天下大乱”之机结党营私的关锋、吴传启一伙，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到一年，还是这个陈伯达，又大批王、关、戚是“小爬虫”、“变色龙”了。

陈伯达6.5讲话之后，“小人物”们是把这篇讲话当作圣旨和真理来看待的。可惜，陈伯达6.5讲话的有效期很短，有效性也成问题（因为陈伯达在同一时期还讲了不少支持聂元梓的话，大大抵消了6.5讲话的效力），到8月底就彻底失效了。应当指出，陈伯达曾4次就6.5讲话向聂元梓表示道歉，第一次是1967年7月10日晚，正是北京公社砸抄保卫组的当天晚上；第二次是1967年8月3日市革委会会议后。<sup>1</sup>这两次道歉都是关锋、王力还在台上，北大反对派闹得最凶的时候。6.5讲话已经给北大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深重伤害，私下的道歉有什么用呢？陈伯达敢到北大来公开道歉吗？

引发6.5讲话的一个直接原因是5月27日陈伯达、关锋、王力召见聂元梓的事情，他

<sup>1</sup>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319页。

们对聂威胁利诱，又打又拉，要求聂不要公布吴传启的材料，聂当场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后除隐患战斗队公布了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调查材料，于是陈伯达急了，亲自出面进行打压。事后的8月3日，陈伯达却又对聂元梓说，“5月27日的批评，不要当回事。”<sup>1</sup>陈伯达的6.5讲话和其后的若干讲话，明显有自相矛盾之处，又似有某种不得已的难言之隐，因此，笔者总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背后可能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况。笔者没有条件深入研究，祈望未来的研究者能够关注这一点，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陈伯达6.5讲话的刺激下，北大大乱起来了。6月6日，北京公社在校园里铺天盖地刷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火烧聂元梓！打倒孙蓬一！”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加上“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等组织，北大的反对派们一下子兴奋起来，以为打倒聂、孙，由他们取代校文革的日子就要来了。北京公社还多次组织人员冲击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方面举行的大会。期间，社会上的某些组织也派出广播车，闯进北大校园大叫大嚷，为他们呐喊助威。

陈伯达的6.5讲话固然搞乱了北大，但问题的主角关锋也陷入了深深的惶恐之中。时为学部历史所研究生的孟祥才有一段回忆：

“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会场的中间，基本能看清他们几个人的面部表情。我发现关锋有点精神萎顿，面色蜡黄。他讲话时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不是鼓励人们如何同‘走资派’进行斗争，而是批评‘怀疑一切’的倾向。他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就直接提到有人反关锋的问题，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

<sup>1</sup>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319页。



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关锋。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赵易亚、林杰一起垮台了。”<sup>1</sup>

关锋、吴传启一伙的所作所为，是不能见光的，也是“犯忌”的，一旦被揭露，便惶惶不可终日。北大闹得越厉害，越乱，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越大，对这一伙人其实越是不利。吴传启、林聿时、卢正义等人早已逃往外地，回北京的日子遥遥无期，外表的强大掩饰不住内心的虚弱和焦虑，关锋当然要“精神萎顿”了，“昔日的霸气”也就荡然无存了。连戚本禹对关锋都搞起了两面派。戚本禹在会场上当面为关锋说情，但关锋清楚得很，会场上有一些人是学部“大批判指挥部”的，当时也在积极地揭发、批判吴传启，而在幕后为“大批判指挥部”撑腰的，正是戚本禹。

### 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陈伯达6.5讲话指责聂元梓想夺谢富治的权，想当革委会主任，校内校外的反对派也一直这样指责聂元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欲加之罪。聂元梓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个能力，聂元梓想做的，就是起个监督的作用，而聂的这个想法，还是在陈伯达谈话的影响下产生的。

聂元梓回忆说：

“1967年3月28日，在大会堂，陈伯达问我：红代会最近干了什么了？我说，今天下午刚开了一个核心组的会议，分析了各个学校运动的发展情况，分三类。准备再进一步对各校做些促进联合的工作。接着他说：红代会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叫你在市革委会中多起些作用。叫你做副主任的工作，就是这个目的。你是红色政权中的新生力量。我们是很重视你的。你是从群众中来的，代表群众的。谢副总理这个人很好，郑维山、傅崇碧、吴德这些同志都很好，但是他们都有老脑筋。比如谢副总理吧，他过去是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总会受些影响吧。我这不是叫你反谢富治，是叫你了解这个情况，更

<sup>1</sup>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好地发挥你们的长处，克服短处，这样，团结在一起，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有影响的。我这个人就有很多旧的东西，在同红卫兵接触中，我就受到很大的教育。

“我听了陈伯达的谈话，最突出的觉得谢副总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长期工作的，我想进一步知道这个情况。回家后，我找了聂真，知道他同谢副总理过去在一起工作过。我问聂真，到底谢副总理怎样？聂真说：过去是邓小平重用的干部，并说谢能带军队，能做地方工作，这个人比较淡定，在党的斗争中，他不轻易表态，都是在最后再表态。这样使我对谢副总理产生了怀疑，‘长期重用’，‘总会受些影响吧’，认为陈伯达的意见是对的，我应当在市革委会中进行‘监督’、‘发挥作用’。这样，在4月8号，谢副总理召开会议，宣布市革委会组成人员的时候，我曾给蒯大富写了一个条子，告诉他，谢副总理是长期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干部，是邓重用的，能文能武的干部。我把这个内容告诉他的目的，是叫蒯大富也要在红色政权中‘发挥作用’，‘进行监督’。”<sup>1</sup>

北京市革委会成立了，聂元梓当了副主任，“五大领袖”中的另外四位当了常委。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用来摆样子的。秘书长周景芳号令一切，横行霸道，要害部门都掌握在学部联队一帮人手中，连吴德这样的人也受到排挤，聂元梓就更不用说了，她想要一份市革委会成员的名单，要了多次都没有要到。作为副主任，聂元梓在市革委会有一间办公室，也收到许多群众来信，聂元梓忙不过来，请示吴德，吴德也没有办法，便要聂从北大调个人来协助处理来信，但不算市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于是聂元梓从北大找了一个年轻的党员教师协助工作。不料没有几天，谢富治就在会上发话了，“啊？！有的人还在这里搞什么办公室？！”听到这话，这位教师赶紧回学校向聂报告，商议结果是马上撤回来。这位教师把聂办公室的钥匙交给吴德的秘书，就回来了。<sup>2</sup>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好像对北京市革委会的真实情况毫无了解。1967年

<sup>1</sup>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315页。

<sup>2</sup> 这是听一位北大校友说的。当年这位教师和聂商议撤回来的时候，该校友恰好在场。五十年后，该校友偶遇这位老师，问起往事，才知道事情的前后经过。

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对聂元梓说：“你主要在市革委会起作用，市革委会工作我看还是搞不上去。北京市也比较复杂，我是愿意叫你参加核心组的，这可以充分发挥你的作用。”<sup>1</sup>市革委会确实有一个核心组，但那是周景芳一伙把控的真正的核心，让聂元梓参加核心组，岂不是痴人说梦？

聂元梓的“野心”，仅仅是想发挥一点“监督作用”而已，但这是不被允许的。戚本禹通过周景芳和学部联队的一伙人操控市革委会，那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这是一个团伙，能容许外人来监督吗？这伙人嚣张跋扈，有恃无恐，丝毫不怕这样做会暴露了他们的野心。谁给了他们这种勇气和自信？面对这种状况，聂元梓对谢富治有看法，不是很正常吗？谁给谢富治提意见，谁就是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这是什么逻辑？聂元梓还揭发过安子文呢，怎么不说她想当中组部部长？蒯大富组织元旦大游行，打倒刘少奇，能说蒯大富想当国家主席吗？

聂元梓对谢富治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很有限的。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的问题，也不是最主要的，他在公安部长和中央专案组所任职务上犯下的罪行，要严重得多。

### 关于“揪出周景芳”

“小人物”指责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借揪潘吴把矛头指向学部联队和市革委会，提出‘打倒吴传启，揪出周景芳’‘要从市革委会揪出一批投机分子来！’”。聂元梓、孙蓬一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出过这样的口号？

孙蓬一4.12讲话讲得很清楚：“有的人在外面甚至造谣讲，原学部的周景芳是中央文革成员，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事实上周景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孙蓬一只不过是揭穿了一个谣言而已，怎么就变成“揪出周景芳”了呢？新北大公社要揪的是吴传启，还轮不到周景芳。“小人物”为什么要替周景芳担心呢？

---

<sup>1</sup>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319页。

陈伯达对北京市革委会的组建是有看法的，也知道毛泽东的看法：“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sup>1</sup>，但他在6.5讲话中仍然要为周景芳站台：“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

（谢富治插话：他是好人，是造反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陈伯达这句话，不仅撇清了自己同周景芳的关系，还向公众表明周景芳的后台就是戚本禹。另一方面，陈伯达还曾经提醒过吴德要注意周景芳一伙（时间应该在1967年春夏之交，关锋、王力垮台之前）。吴德1970年1月11日讲话说：“他们（指周景芳一伙——引者）在市革委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sup>2</sup>吴德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务副主任，连他都不知道自己被架空了，听到陈伯达的提醒还一脸茫然，可见北京市“让一派操纵了”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陈伯达以贬低吴传启的方式来批评聂、孙：“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呀？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事实真相是：吴传启一伙确实控制了北京市革委会的要害部门，吴传启也一度控制了《北京日报》。吴德晚年在回忆录中说：“（北京市革委会）新进来的人大都是王、关、戚支持的学部的那一派，约二十多人。哲学所的造反派头头周景芳担任了市革委会的秘书长，杨远担任了办事组组长。办事组等于是市委的办公厅，一切机要都由杨远控制了。……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sup>3</sup>

“拉大旗，作虎皮”是吴传启们一贯的手法，他们仗着关锋这个后台的支持，制造出一种气氛，“反对吴传启就像犯了弥天大罪一样”，孙蓬一4.12讲话宣告：“我今天就

<sup>1</sup> 卜伟华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第611页。

<sup>2</sup> 《1970年1月11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见宣讲家网，<http://www.71.cn/2012/0410/513855.shtml> 2016.2.29

<sup>3</sup>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第36—37页。

要公开表示，我们就是反对一下吴传启！”在“孙大炮”的轰击下，吴传启只好化名远遁。陈伯达说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呀？”，客观效果是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剥去了吴传启“左派”的光环和吓人的虎皮，吴传启再不可能耀武扬威了。

没有想到的是，竟然连谢富治也抱怨说他受到了周景芳的要挟和威胁。

笔者寻获了一份《谢副总理在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8.3.25 下午）》，刊登在北大井冈山兵团北斗星简讯编辑部主办的《北斗星简讯》1968年3月26日的增刊上。

谢富治在这个讲话中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其中一段与周景芳有关。谢富治说：“对一些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为进行原则斗争表现较弱。这同‘私’字、‘我’字有关。例如去年4、5月间，革命委员会中的坏人周景方，他给我写了一封通牒性的信，说我没有支持他搞派性。当然，我不支持他搞派性，我跟他有斗争，但斗争得很不够，而且没有把这封信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伯达、康老、江青等同志看（注意：根本没有提周恩来——引者）。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周景芳要搞派性活动，谢富治在某些问题上没有支持他。于是，仗着有后台支持，周景芳竟然给谢富治写了一封“通牒性的信”，进行威胁，可见其根本没有把谢富治放在眼里。而谢富治竟然忍气吞声，都没有把这封信向上级报告。谢富治自己都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要让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谢富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要如此地委曲求全、甚至不敢向上级报告呢？

谢富治在这次讲话中提出了“变色龙，小爬虫王、关、戚、周景芳”的说法，讲话末尾有16个口号，其中之一是“打倒王、关、戚！打倒周景芳！”

事实证明，周景芳确实是王、关、戚、吴传启团伙的成员。关锋垮台之后，周景芳被揪回学部。戚本禹垮台之后，周景芳立即被抓了起来（百度周景芳条目显示，其在市革委会任职时间为1967年4至9月，1968年1月至1979年12月被关押）。

## 关于“攻击《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

在“小人物”心目中，《北京日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反对《北京日报》成了聂、孙的一条罪状。“小人物”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了“孙蓬一等人要求北大广播台广播北航红旗观察员文章”的事情。笔者当年不了解这件事情，也没有读过这篇文章。这次设法找到了当年的小报，才明白“小人物”们为什么要讨伐这篇文章了。正如吴德后来说的，“革委会成立后《北京日报》恢复出版，学部派来的涂武生控制了《北京日报》，实际上，真正控制的是吴传启，吴传启背后操纵涂武生，所有的社论、消息，都要经过吴传启看过。”被吴传启们控制的《北京日报》，其立场、观点必然会代表这个团伙的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也必然会遭到抵制。北航红旗的《红旗》报1967年5月30日第42期刊登的观察员文章《〈北京日报〉近来在为谁说话？》，对这个团伙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揭露和批判。针对《北京日报》5月28日社论里提出的“现在特别要批判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分裂主义倾向”这一论调，北航红旗观察员文章写道：

“不错，我们要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分裂主义倾向。”

“但是，我们必须弄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分裂主义？到底是谁在背后心怀鬼胎，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煽动搞分裂？难道不正是那些装扮成‘左派’的叛徒和坏蛋在搬弄是非、制造分裂吗？难道不正是他们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在革命队伍中拉一派打一派，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吗？批判分裂主义，难道不正是要把那一小撮口喊团结，实则幕后搞分裂的罪魁祸首揪出来吗？”

“他们现在对大批判一反常态，阳奉阴违，可见他们当时并不是在真正批判，而是在吹捧叛徒，为某些人捞政治资本，为他们登台表演大吹大擂，为他们篡夺领导权制造舆论。他们一方面扣压他们嫉恨一方的稿件，一方面大登特登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一些人的文章，借报纸制造思想混乱，这难道仅仅是宗派主义所能解释的吗？不能！这是他们在利用报纸扶持和拉拢一部分社会力量，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我们要问：《北京日报》到底掌握在谁手里？是谁把黑手伸进了《北京日报》？”

观察员文章当然有许多那个时代的印记，但上面所引的文字，其矛头所向，不正是孙蓬一揭示的那个“摘桃派”团伙吗？在那个时代，要写出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深刻的观察力，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对此，“小人物”们是理解不了的。

至于《光明日报》，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该报的一派组织，同吴传启、学部联队关系密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时为学部历史所研究生的孟祥才回忆：“所谓大批判开始，吴（传启）、林（聿时）利用他们与王、关、戚、穆欣、林杰等人的关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出尽了风头。”<sup>1</sup>实际上，这不是简单的出出风头的问题，真正的目的是为这个团伙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制造舆论。

### 关于“攻击《红旗》杂志”

“小人物”的文章指责说：“红旗第七期评论员文章，聂元梓同志却要批判，说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炮打中央文革，分裂中央文革吗？”看来，在他们心目中，《红旗》杂志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笔者当年没有关注《红旗》杂志的文章，也没有听到过聂元梓有什么评论，这次看到“小人物”的文章，才把这期《红旗》杂志找来，拜读之下，不无疑问。

1967年的《红旗》杂志第7期是5月20日出版的，其评论员文章题为《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题目。该文有一段是谈左派群众组织之间矛盾的，照抄如下：

“左派群众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左派内部的是和非的矛盾。有的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不正确的。有的是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方错误多些，另一方错误少些。有的是一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而在那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另一方恰恰相反。上述种种，是有着原则分歧的。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他们的对立面，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认清了主要敌人，

<sup>1</sup>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抓住了主要矛盾，左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双方的争论，可以协商解决。双方一时不能解决的次要的问题，则应该求同存异，共同对敌。这不叫无原则，不叫和稀泥，不叫折衷主义，不叫调和主义，而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正确做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性的表现。相反，如果左派组织之间互相抓住争论的问题不放，把枝节问题看得比天还大，热衷于打内战，放松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这恰恰是没有原则性，是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恶劣表现。”

从表面上看，以那个年月的标准，这段话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红旗》杂志掌控在陈伯达、关锋、林杰等人手里，他们若要在冠冕堂皇的文字里面塞点私货，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聂元梓、孙蓬一4月10日向江青、陈伯达进言时指出关锋、王力、吴传启等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左派内部的是和非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次要的”，不是“枝节问题”，不是“可以协商解决”的问题，双方的大方向完全不一致，揭露这个团伙决不是“打内战”，决不是“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上引《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这一段话，如果隐含着指责新北大公社揭发吴传启团伙的意思，那么真的是“为他们自己服务”了。

### “小人物”在1.15抢档案事件上的立场

“小人物”的文章提到1.15事件：“1月15日《红色联络站》洪涛等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谢富治同志处理了此事，将洪涛放了，且肯定他是左派，而将民院抗大郑仲宾拘留了十五天。”

笔者当初认为谢富治在处理1.15事件上有问题，只是根据“公安部某负责人谈话”作的推测。但“小人物”明确说，此事就是谢富治处理的。这种内幕信息当时只在洪涛一伙内部流传，“小人物”是怎么知道的？

1967年1月15日凌晨，刘郅（统战部官员）、洪涛（学部民族研究所干部、学部联



队头头）、曹振中（学部近代史所干部，学部联队队长）等人，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抢走了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大批档案。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郅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抢档案就是抢档案，所谓“接管”，完全是欺人之谈。多年后，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海鹏在其学术自传《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只是1.15清晨，张德信打来电话，告民族所洪涛和红卫兵联队曹振中组织人抢了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柜，其中有15个柜子无处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随后有人开着卡车拉来15个铁柜。我让他们把15个铁柜分别放到几处屋檐下，没有同意放进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对铁柜加了封条。”<sup>1</sup>

洪涛所在的民族研究所是属于学部的，洪涛本人也是学部联队的头头。<sup>2</sup>曹振中和张德信都是学部近代史所的，曹振中还是学部联队的队长。张海鹏的回忆证明，学部联队直接参与了这起抢档案事件。抢了那么多的档案，甚至要用大卡车来拉，到了凌晨还有15个柜子不知道往哪里存放，要临时找存放的地方，这是保护档案吗？如果真是保护档案，为什么不拉到公安部或卫戍区去呢？显然，他们本来是想控制这些档案的，准备用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太狂妄了，没有估计到会遭到那么多革命群众的抵制，几个头头还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惊动了中央。

然而吊诡的是，过了一夜，刘郅、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公安部还印发了一份《公

<sup>1</sup> 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index/fdxf/201804/t20180402\\_3894766\\_1.shtml](http://www.cssn.cn/index/fdxf/201804/t20180402_3894766_1.shtml)

<sup>2</sup> 据孟祥才所撰《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一）》一文（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率学术代表团访华，学部被指定为接待单位，第一次接待活动是座谈会，由学部造反派头头洪涛主持。

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说刘郅、洪涛等人是左派，抓他们是犯法的。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到公安部理论。洪涛等人又以冲击公安部和迫害左派为名，将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郑仲兵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收下，并将其关押了13天。

这天夜里发生了什么？这中间有什么鬼？有什么黑幕？

据笔者所见新北大公社独立寒秋战斗队1967年9月的一份调查材料，洪涛、刘郅一开始在公安部是受到讯问的，洪涛承认“这种搞法有严重错误”，刘郅也承认1.1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与此同时，他们的后台也在加紧活动。来自于民族歌舞团的一份信息说：“1.15事件以后，我们还听说这天晚上吴传启一夜没睡，守着两个电话，看刘郅、洪涛出来了没有；在三月初，我们又听我团文革委员×××同志说：‘刘郅、洪涛是通过吴传启、穆欣、关锋（出来的），是关锋打电话叫公安部放的。’”洪涛、刘郅从公安部出来以后，神气活现地在圈内宣扬，说谢富治副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向他们“道歉”，“表示慰问”，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扣留是非法的”，还说“公安部要发表声明”，而且由洪涛“自己写”，等等。

果然，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3000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实际上是洪涛自己写的）。

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闭保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中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郅、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机，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予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吴传启团伙的后台果然了得，不但要把洪涛、刘郢等人捞出来，还要借机用公安部文件封他们为“革命左派”，把革命群众保护档案、抓获洪涛、刘郢的行为说成是“非法绑架、斗争、拘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连公安部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受到“违法乱纪”的指责，被责令“公开检讨”，还要“予以处理”。颠倒黑白，以至于此。

吴传启、关锋、谢富治之间如何通电话，谢富治如何接见洪涛、刘郢，说了些什么，这在当时都是机密，只有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能知道。而泄露天机、弄巧成拙的就是这份“讲话”。

这份“讲话”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讲话”印发以后，立即为吴传启团伙所利用。对于维护团伙利益、打击异己而言，该“讲话”起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份不正常的“讲话”也暴露了“公安部某负责人”和坏人勾结的真实面目。看到“讲话”，

人们不禁要问：“公安部某负责人”究竟是谁？显然，这就是谢富治。没有谢富治同意，是不可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名义印发这样的文件的。许多群众对谢富治的怀疑，也由此而起。笔者对谢富治有所怀疑，也由这份“讲话”引起。

这一事件造成统战、民委系统的大分裂，是北京市第一个全系统分裂成两大派的地方。

对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1.15抢档案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涉及原则问题，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认为谢富治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孙蓬一在4.12讲话中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方，发出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绝对不能做奴隶主义，绝对不能盲从”的呼喊。

“小人物”们为什么要和抢档案的那伙人站在一起呢？

### 关于北京市的两大派

“小人物”称：“自从一月份夺权以后，孙蓬一就将北京各组织分成两大派”，“北大到处抢权”。

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两大派不是孙蓬一分的，更不是孙蓬一有本事分得了的。两大派的出现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且主要是关锋、林杰、吴传启、林聿时、卢正义等一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遭到广大群众和许多群众组织抵制而产生的。关锋的学生、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晚年时也说：“关特别支持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吴传启、林聿时为首和北京师范大学以谭厚兰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即后来属于‘地派’的造反派组织，给他们很多指导。”<sup>1</sup>

关锋、吴传启、林聿时很早就有合作，以“撒仁兴”（三人行）的笔名在《哲学研究》和《新建设》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们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孟祥才语），名气很大。关锋、吴传启、林聿时还是康生手下“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核心组成员。

<sup>1</sup> 阎长贵：《我所知道的关锋》，原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4、5期。

林杰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进入《红旗》杂志，成为关锋的徒弟兼同事。这些人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纷纷发表批判文章，他们的文章无限上纲，杀气腾腾，由此抢占了政治制高点，成为全国知名的、响当当的“左派”。值得注意的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关锋、吴传启联名发表文章，不再用“撒仁兴”的笔名。关锋、吴传启署名的批判吴晗的文章曾登上1966.3.19《人民日报》，这成为吴传启的新的政治资本。

随着关锋进入中央文革，吴传启、林聿时等人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政治动向。他们于1966年5月23日在学部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早两天），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之后一路横扫，将当时学部领导和一大批司局级干部打成走资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吴传启、林聿时这伙人总是能够及时地跟风转向，成为“永久牌的高手”（孙蓬一语）。他们本来是和工作组一起领导学部文革并参与决策的，他们本来受到过陶铸讲话的保护，然而，在工作组撤销和陶铸被打倒以后，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后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工作组的英雄、反对陶铸的英雄，并且用暴力摧垮了反对派。<sup>1</sup>在进入1967年的时候，吴传启、林聿时一伙在学部实现了“一统天下”，由吴、林在幕后操纵，由年轻人（年龄上相当于北大年轻教师）当头头的“学部红卫兵联队”也成了一支劲旅和关锋的“亲军”。吴传启等人通过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可以操控民委统战系统的文革运动，通过经济研究所的某些人，可以把手伸向计委、经委和国务院系统。不仅如此，1967年2月，学部联队头头王恩宇，居然还以中央文革的名义，经过谭厚兰从北师大借调了二十几个同学组成调查组，调查中央各口的情况。后来，谭厚兰自己都说：“现在看来，这个调查组问题很大。”<sup>2</sup>

关锋的另一支“亲军”，是谭厚兰领导的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是北师大政教系1961级的调干生，文革开始时已经29岁了。文革前，谭厚兰被借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忙，由此与林杰相识。据说谭厚兰本人并无主见，一切都是听林杰的。“在北师大，几乎所有的

<sup>1</sup> 详见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sup>2</sup> 参见“谭厚兰的检查”。

人都知道林杰是中央文革（实际上应是关锋——引者）的传声筒，谭厚兰是按林杰的旨意操作的。”<sup>1</sup> 谭厚兰自己承认：“我们同林杰的接触是很多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在许多问题都受了他许多影响。”<sup>2</sup>

吴传启曾经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作过，因此他的住处并不是学部的宿舍，而是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恰好，卢正义也住在那里。卢正义是高教部第一个写大字报的人（5月26日晨），和吴传启的5月23日大字报，行动也很一致。1966年12月末，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在戚本禹支持下贴了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卢正义紧接着贴出大字报对李冠英等人表示支持，随后戚本禹公开给予支持。于是，卢正义又闹了个“反陶英雄”的桂冠。

陶铸是1967年1月4日被江青、陈伯达公开讲话打倒的，各群众组织以为这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开会商议建立“批陶联络站”。在会议上，林杰、吴传启一伙力图把卢正义捧上台，把卢所在的“延安公社”列为发起单位，这遭到北大红旗兵团代表的坚决反对。林杰拍桌子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排除在外”。北大同学也拍桌子回击，“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笔者曾多次听这位同学讲起此事）由于卢正义的历史问题十分明显，许多组织支持北大的立场，林杰一伙的目的未能达到。最后是吴传启、卢正义、谭厚兰等另外组织了一个“批陶”机构。这是这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形成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月革命”风暴刮起的时候，北大正在搞军训，整顿内部。重读中央文革1967年1月3日、1月16日两次接见北大代表的记录，可以看到，中央文革根本没有提“夺权”的事情，聂元梓、孙蓬一也没有提出到校外参与夺权斗争的问题。所以，说陈伯达、江青指示北大到社会上去参加夺权，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

真正提出“夺权”的，还是毛泽东。毛在1月16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sup>3</sup>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

<sup>1</sup> 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载《记忆》第150期。

<sup>2</sup> 参见“谭厚兰的检查”。

<sup>3</sup> 转引自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年，第364页。

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其中有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全国各地夺权斗争的展开，实际上都是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的响应。

北大参与社会上的夺权，大的背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直接动因是1967年1月18日晚周恩来谈革命造反派夺权的一次讲话。周恩来的讲话，也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讲话中有这么几句：“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导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督促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sup>1</sup>

周恩来这一讲话，成为北大校文革成立“夺权指挥部”并派人出去夺权的直接依据，但北大的这些具体行动，并未另行请示中央文革。实际上，中央文革中王、关、戚以及他们手下的吴传启一伙对于夺权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路线图，早有计划，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出去夺权，便成了王、关、戚一伙夺权路上的绊脚石。事实表明，北大出去参加夺权的队伍，多处碰壁，发生矛盾的地方，对手都是学部联队和北师大井冈山。北大真正参与夺权的，只有高教部一处。北大和高教部的群众组织“北京公社”先夺了权，但北师大井冈山在关锋、林杰、吴传启一伙策动下支持卢正义和“延安公社”进行反夺权，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卢正义的叛徒问题。<sup>2</sup>虽然当时高教部已经没有业务工作，但能不能让卢正义这样的人来夺权，仍然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清华井冈山也参加了高教部的夺权，面对北大和北师大的分歧，在了解情况之后，清华井冈山声明

<sup>1</sup> 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编：《毛主席的新北大》，1967年11月，油印本。这里引用的是其重新录入的电子版，第28—29页。文革史学者卜伟华对此也有记述：“1月18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左派学生、机关干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鼓励学生参加夺权行动。”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393页。

<sup>2</sup> 谭厚兰自己说，她和吴传启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高教部夺权的时候，但她没有交待详细情况。谭厚兰说，在高教部夺权问题上，“林杰也是无孔不入地发表意见，加剧了矛盾的发展，甚至还去慰问我们被北大打伤了的同学，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些错误做法。”关于卢正义的叛徒问题，谭厚兰承认，他们听信林杰的话，不但不接受北大的意见，反而“公开为叛徒卢正义辩护”。参见“谭厚兰的检查”。

退出。<sup>1</sup>在这一夺权事件中，关锋、王力不顾其中央文革要员的身份，两次打电话给北大，以一面之辞甚至以谣言对北大进行打压。<sup>2</sup>但这样做的结果，正好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聂元梓、孙蓬一原先对关锋、王力并无负面看法，但这一次使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聂元梓、孙蓬一当然不会被关锋的打压所吓倒，相反，正是关锋、王力不惜用谣言来进行打压的不正常举动，引起了聂元梓的警觉。聂元梓的“除隐患”的想法，正是产生于1967年2月关锋、王力两次电话之后，其时，新北大公社还未成立。

关锋、王力为什么要死保卢正义呢？康生为什么也要保卢正义呢？原来，卢正义的历史牵涉到张春桥。

据丁健所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缅怀刘季平同志》一文，卢正义是张春桥的故交，历史上两次被捕变节。第一次被捕后，神秘逃出到张春桥处，张春桥多次写材料证明卢没问题。至1967年，张不愿再写证明。<sup>3</sup>在这种情况下，卢正义的潜逃和失踪就不难理解了。总之，绝不能让卢正义落到群众组织手中。

现在反思，联想到毛泽东始终不准调查张春桥的态度，北大当时抓住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不放，实在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至此，聂元梓不仅仅是一块绊脚石了，对某些人来说还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聂元梓要继续追查卢正义，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了。可

<sup>1</sup> 参见胡宗华口述、嘉仁整理：《我在清华参加文化革命》，载《华夏文摘增刊》2017年7月3日第1086期。胡宗华当时是清华井冈山成员，奉命去高教部处理清华井冈山参与夺权的事情，他回忆的情况是：“卢正义解放前在上海被捕，押到了江苏反省院，在反省院里面写了很多的肉麻的吹捧蒋介石的诗，他应该是叛徒，叛变了革命。在他的档案里写的是有变节行为，没有定为叛徒。组织结论定为变节行为，实际上就是叛徒，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而且这个组织里面还有另外两个人也有叛徒行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那么多叛徒，我当时就很反感。可是再一看延安公社后面有学部红卫兵吴传启的支持，有北师大谭厚兰的支持，有《红旗》杂志林杰、关锋的支持，根子相当的硬，绝不是清华大学拿了一个教育部夺权委员会头头的章就能领导得了的。晚上和教育部的两派开会回来，清华学生自己研究怎么办。我说算了吧，我们不搅混水了，要让我支持北京公社，但我明显知道延安公社后面有中央文革作后台，你是惹不起的一拨人。你要是支持延安公社的话，支持一大窝子叛徒当权的组织，我心里实在不甘心，干脆咱们退出去。当天晚上半夜了，清华大学发表声明退出高教部的夺权委员会，不再掺和了。”

<sup>2</sup> 据查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编：《毛主席的新北大》，电子版第163—165页，关锋、王力在2月2日下午打电话给孙蓬一，根据北师大井冈山的一面之辞对北大进行指责，且不容孙蓬一申辩，关锋还说：“你们就不应该去”。北大的队伍于当晚撤回北大。关锋、王力于2月4日再次打电话给孙蓬一，指责北大“要组织人搞三路进军，一路冲钓鱼台抓关锋，一路到《红旗》杂志抓林杰，一路冲北京卫戍区。”关锋发很大的火：“你们来吧！我们等着你们！”孙蓬一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关锋厉声说：“我查过了，我们的消息既非来自师大，也不是来自‘延安公社’，而来自军事机构，很可靠！你们来冲吧！来了我们也不怕！”王力指责说：“你们这是严重错误，你们要走向反面，你们转了向了。”孙蓬一再要解释，关锋说：“我们不要听了。”关锋既然说他的消息很可靠且来自军事机构，为什么不追查到底呢？搞“三路进军”，至少也得有上千人马吧？那还不好查？再者，为什么5月27日那天聂元梓提起关锋、王力2月4日电话时，关锋又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打过那个电话呢？

<sup>3</sup> 平眼看他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692924232>



以说，“一月夺权”之时，聂元梓已濒临险境，即将成立的新北大公社，必将被视为异己（半个世纪后回看，我们是否应该庆幸这种被当作异己的待遇呢？）。

到1967年2月，我们惊讶地发现：在1.15抢档案事件上声明支持洪涛等人的若干组织；民族学院两派武斗，公开声明支持民族学院东方红的若干组织；以及在高教部夺权问题上公开支持谭厚兰的那些组织，竟然是高度重合的。在北大忙于军训和整顿内部的时候，在新北大公社还没有成立的时候，社会上一派强大的势力已经形成了，已经在统一的指挥下统一行动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暴露无遗。我们，只不过是看到了面前的事实而已。

进入3月份后，又是以学部联队和北师大井冈山为首的这一派势力，掀起了“反二月逆流”的狂潮。“反二月逆流”的狂潮如此猛烈，以致没有一个群众组织可以回避，都必须表明态度。但是，由于“反二月逆流”是中央文革在幕后策划的，采取的是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反二月逆流”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非常可疑的现象，这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警惕，于是，群众队伍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形成所谓“打倒派”和“炮轰派”。关锋、王力、戚本禹原本希望通过“反二月逆流”给自己的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不料弄巧成拙，进一步暴露了自己。回想当年，看到冲在“反二月逆流”最前面的正是那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的时候，笔者感觉到深深的恐惧。

据学部联队某头头揭发，1967年4月1日夜里，或4月2日凌晨，关锋、王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吴传启、林聿时。其时，中央文革正要成立宣传组或大批判组一类的机构，关锋、王力打算把吴传启、林聿时安插进去。正在商议时，《人民日报》的人送报纸大样来了。王力审看大样时，关锋对报社的人说，“你们不是缺文章吗？就找他们（吴、林）要好了。”

此前，戚、关、王一伙已经把学部联队的周景芳安插到筹备中的北京市革委会去了（任中共北京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市革委会常务秘书长兼政治组组长），这次，又打算把吴传启、林聿时拉到中央文革××组里面去。但是，意外发生的4.8民族宫事件

和孙蓬一 4.12 讲话，打乱了、打断了他们的部署。孙蓬一的 4.12 讲话揭露了这个团伙的真实面目，揭露了他们的野心，这个团伙不断篡权窃权的美梦成了泡影。吴传启、林聿时没有能够进入中央文革××组，不久便走上了化名逃亡之路。经营了快一年的“事业”毁于一旦，可以想见，关锋、戚本禹、王力、吴传启一伙，对聂元梓、孙蓬一及新北大公社，会有多大的仇恨了。

### 关于孙蓬一 412 讲话“攻击地院东方红‘靠打砸抢起家’”

“小人物”指责孙蓬一的 4.12 讲话“攻击地院东方红，说它‘靠打砸抢起家’‘历史丑恶得很’”，云云。这完全是张冠李戴。孙蓬一说得很清楚，指的就是学部吴传启一伙：“有部分群众反对硬把潘梓年作为当然的文革成员，而这部分群众就变成反对派。他们是怎样对待这部分反对派的呢？原来的对立面叫红卫兵总队，几乎所有红卫兵总队的办公室宿舍都被吴传启、潘梓年所控制的红卫兵联队所砸、抄，所洗劫，他们每闯进一个地方，就布置岗哨，割断电线，拿斧子、锤子砸办公室、档案柜，翻箱倒柜，动手行凶打人。不完全统计，自 20 号以来，学部红卫兵总队多名群众，有九十四人被打，几十个人被搜，五十人以上被抄家，四十五人被非法斗争和绑架；有 116 个办公室、133 个办公桌、41 个保险柜和文件柜被砸被抄，被抢走粮票 60 斤，布票 37.5 尺，人民币 200 元和大量的私人信件和笔记，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毛主席照片。同志们，难道说坚决贯彻打砸抢，靠打砸抢起家的人，我们能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左派吗？另外一个单位到处发表他们的文章，到处安排他们的势力，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考察吴传启一伙的历史，确实“丑恶得很”。原学部历史所的孟祥才多年后回忆道：“1967 年初，吴传启、林聿时操纵联队，以打、砸、抢、抓、抄的血腥手段，将总队打垮，暂时实现了他们在学部的‘一统天下’。”<sup>1</sup>

<sup>1</sup>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原载《历史学家茶座》，2011 年第 2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笔者在孙蓬一的讲话中没有找到指责地质东方红“历史丑恶得很”这样的字句，倒是有一段话讲了在地质东方红早期困难的时候，北大校文革是支持过他们的。


### 关于聂元梓找刘泉要康生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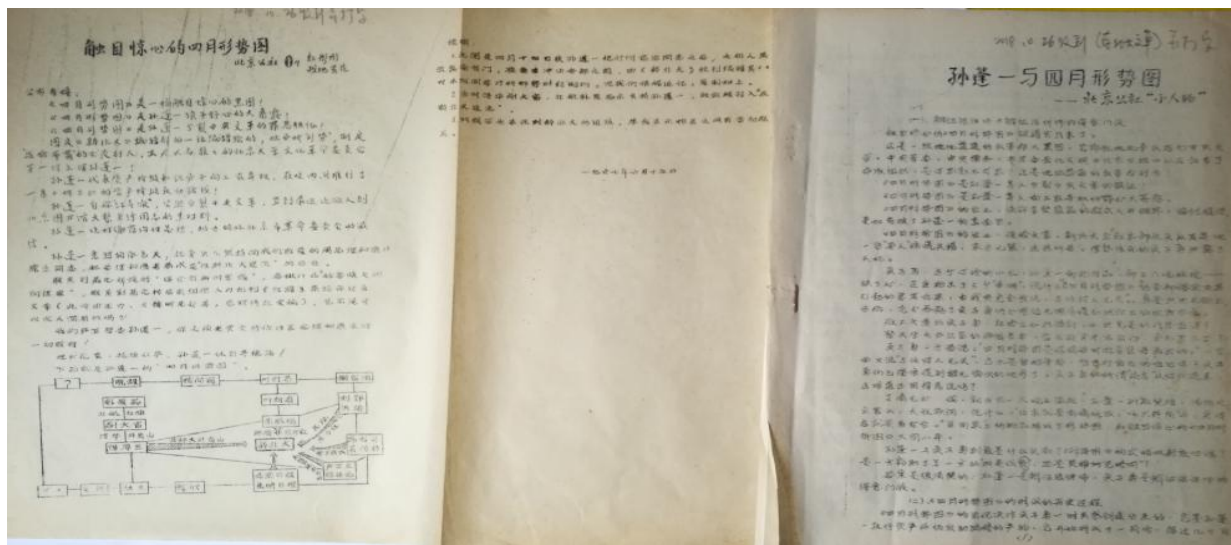
“小人物”的文章，貌似材料充足，但真伪杂陈，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指鹿为马、张冠李戴之处不少，笔者无法一一指出。谨再举一例，“小人物”说“聂元梓亲自到清华找刘泉要康生的材料”。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纯属臆测。清华大学叶志江、刘泉等给康生贴大字报是1967年1月17日和19日，“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成立和发布公告是1月21日。22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给蒯大富，对此做了严厉批评，蒯大富马上做了检讨。那天上午，笔者去中央党校看大字报，党校的广播里正在播陈伯达批评蒯大富的电话稿。这是1月份的事情，高教部夺权事件还没有发生，聂元梓、孙蓬一还没有形成对关锋、王力的负面看法，聂元梓怎么可能亲自去找刘泉要康生材料？聂元梓、孙蓬一对康生有所怀疑，还要在很久以后。

## 五 结束语

在聂元梓、孙蓬一带领下，新北大公社向吴传启团伙发起了攻击。这一行动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中央文革内部有人在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要窃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必须揭露这伙“摘桃派”，要“清君侧”，其本意仍然是拥护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聂元梓、孙蓬一和新北大公社不可能认识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能够顶住陈伯达、关锋、王力一而再、再而三的施压，已经很不容易了。

“小人物”写出《孙蓬一与四月形势图》之时，自以为把这些“材料”当作法宝祭将起来，聂、孙必垮无疑。但是，形势并没有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闹腾了两个多月，到

了8月底，聂、孙居然没有垮台，关锋、王力、吴传启一伙却垮台了。不管怎么样，北京公社“07红彤彤、战地黄花”和北京公社“小人物”的两篇文章能够保存下来，还是一件幸事。 



附图：两份材料首页的照相版

## 【评论】

# 事实与逻辑之二

## ——与宫香政同学的再讨论

俞小平

我的同系同年级同学宫香政最近又想起我来，在《记忆》第234期发表的文章《论“政治倾向性”》，再次表达了他对几件北大文革往事与我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对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本属正常，但是必须有事实与逻辑作基础，在《论“政治倾向性”》里我没有看到应有的事实与逻辑。我不免在这里解释一番，以免不知情的读者被宫香政同学误导而误会我的本意。以下分三段论述：

一．“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三种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二．宫香政被定为“三种人”冤枉吗？

三．牛辉林有什么罪？

## 一．“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三种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在《记忆》的一些关于文革的文章里屡次提到“三种人”，这里有必要简介一下。维基百科里《三种人》条对“三种人”作了如下解释：

“‘三种人’指的是：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主持这场运动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派，以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为主，目的是防止改革开放的方针被‘文革’遗留分子翻案。清理‘三种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内进行人事调整的一项政治运动。”

文革结束以后，重新上台的反文革的老干部领导层对文革中的大量犯罪分子判罪，对于那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或罪行而又不够司法起诉判刑的，采取了界定“三种人”的清洗方针，将他们赶出干部队伍。这里所示的三种人的定义模糊，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偏差，以致于一些没有严重错误或罪行的人也被冤枉地戴上三种人的帽子，终身不得重用。

我在《记忆》第 172 期的《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以下简称《真相的迷雾》）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宫香政同学记在心里、屡次引用，这次又被他截头去尾，用在《记忆》234 期的《论“政治倾向”》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论“政治倾向”》里的引文。我把我的原文整段录在下面：

“虽然井冈山遭受聂元梓校文革和 63 军工宣队的接连诬陷和打击，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徒刑或被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也说明校文革制造的案件全部都是冤假错案！”

下面宫香政在文中承认了“俞文这段话是事实。”很好，宫同学这次肯面对事实。但是接下来的一段话，令我极为惊讶：

“俞文这段话是事实。俞文在这里向读者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经过邓小平的清算，证明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错误的，而对立派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是正确的。然而，俞小平却隐瞒了造成这种政治结果的背景和一系列的隐情。”

我已经在《事实与逻辑——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载于《记忆》第190期，以下简称《事实与逻辑》）里据实反驳了宫香政同学的上述说法：

“宫香政同学这段话是出于对我的观点的毫无根据的猜想。我从来没有说过北大文革中井冈山兵团是“正确的一方”。文革发动的动机是错误的，两派成立的宗旨是错误的，在政治大局上哪里会有“正确的一方”？两派犯错误只有多与少的区别，不是有与无的区别。希望宫同学不要在我的行文中想象出我没有表达过的意思。井冈山犯的错误少，没有人受刑事处分，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权，没有被文革中的无限权力所腐蚀。错误需要检讨，罪行需要清算。非法致人死命，非法抓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非法酷刑逼供，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都要被清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历史的报应。毋庸讳言，文革后清算文革中的罪行和三种人确有政治倾向。同样的罪行，在政界有背景的逃过去了，没有背景的只能去坐牢。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你送入牢房？”

如今宫香政同学更进一步，竟然将本文作者，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百姓，与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的所谓阴谋诡计联系在一起，竟然不需要提供任何事实根据。由此可见，宫香政同学的思想受文革斗争哲学阴谋论的为害有多深。

我在《事实与逻辑》里探讨了史学论文中的事实与逻辑，就是希望宫同学能明白事实与逻辑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深不愿他自堕谎言的罗网。我已经在《事实的逻辑》中说明了史学辩论所必须遵循的要素：

“我们北大老五届，由于文革的干扰，没有读完该读的课程，就被赶出北大之门。但是我们好歹都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又在北大受过几年学术熏陶，说话、做事、研究学问，都得讲究两件事：一是事实，二是逻辑。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合乎逻辑的推导，才能得出正

确的结论，这是我一生都不敢忘却的。没有事实就妄加推论，肯定不能揭示出真相。”

如今宫香政同学竟然不顾事实、不讲逻辑、信口开河，令我深为失望。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我的论点：文革中的北大井冈山兵团没有人被定为“三种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如果宫香政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实，请你把它拿出来。如果没有，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到此为止，不要再无谓地继续下去，浪费你我和读者的时间。

## 二．宫香政被定为三种人冤枉吗？

宫香政同学作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暨新北大公社武斗副总指挥和西线武斗总指挥，在 1968 年 3 月底至 7 月底的四个月的北大大武斗期间，为聂元梓校文革在下列各项事件中做了帮凶：

1. 参加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战略战术；
2. 参加并主持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会议和西线武斗指挥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具体行动；
3. 组织、训练、装备钢一连、革命工人兵团等新北大公社专业武斗队；
4.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执行下列攻击性作战任务：3.29 突袭强占 31 楼打伤大批化学系井冈山成员，冲击在海淀路边作为井冈山楼群唯一出口的 37 楼前的校墙豁口和前面的大棚；
5.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捕从 37 楼走出的、在海淀路行走的、在海淀镇购买食品的井冈山成员；
6.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拦截为井冈山运送粮食和物资的车辆，攻击运输和保卫车辆的人员；
7. 派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在北京市的大街上抓捕、殴打井冈山成员；
8. 派出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到住在北京市的井冈山成员家中抓捕、殴打井冈山成员；

9. 派出新北大公社人员以权力机构校文革的名义到外地抓捕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并迫害其家属；

10. 在新北大公社占据的楼群里关押井冈山人员，并对他们施以酷刑。

以上行为也许不都是宫香政同学的职权范围，有些行为在其他新北大公社负责人的职权范围内。

宫香政同学，这是我在《事实与逻辑》里列举的你在北大文革大武斗中所犯的十项罪行。你和其他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参加武装攻击、围困、抓捕、酷刑井冈山和非井冈山成员，你的眼中有他们的苦难，你的手上有他们的鲜血。就凭你的这些罪行，开除党籍、撸掉厂长、定你个三种人不是轻纵了你吗？你还敢自称“受害人”？我们在此辩论，你有权而且应该为自己辩护。可是自2017年7月31日登载《事实与逻辑》的《记忆》第190期发表至今，你没有为我所提及的你和你的同伙在北大武斗中的罪行说一句话为自己辩护，而是始终在没有证据的想象中妄加猜测，纠缠什么“妖怪的背景”。我在《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里列举聂元梓的六大罪状，也没有看到你为她做任何具体罪行的辩护。

《西游记》里的妖怪的最大罪行，不是挡了唐僧的取经路（说到底，那都是如来佛和观音菩萨事先安排考验唐僧的），而是伤了取经路上的人命。我们井冈山兵团，既没有打击、迫害、以至于在校园内以消灭对立派为目的武装开打，挡了毛泽东在文革派全国夺权后召开九大、收割文革胜利果实之路，也没有在武斗中杀害人命、犯抓捕、关押、折磨、侮辱无辜校内师生及其亲属的非法暴行。无论文革中的毛泽东，文革后的邓小平和陈云，或者是文革后复职的老干部，井冈山兵团都不是他们眼前的挡路者和事后的报复对象。毛泽东、邓、陈或者老干部们为什么要清算井冈山？

在北大校内，校文革广建俗称“牛棚”的劳改大院，武斗期间关押多达二百多人的北大干部教师。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据点里，关押过多达数百人的北大师生。多少人被关押、殴打、诬陷、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的被捅死在新北大公



社武斗队员的长矛之下，有的被打死在公社武斗队的刑讯室中，有的英年早逝，有的终身残废。众所周知，井冈山兵团没有牛棚，也没有在武斗期间往井冈山自卫楼群里抓捕关押过新北大公社成员。人都是有感情的，请宫香政同学想一想，这些被你们残酷无情地折磨迫害过的干部、教师、职工和学生，能站在你们一边吗？至于你对邓小平和陈云的论述，你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看不出这与井冈山兵团的命运有什么相干。

### 三．牛辉林有什么罪？

牛辉林同学在北大文革史上是个名人。他是北大法律系64级学生，在反聂五派联合以前是“红旗飘战斗队”的头头。1967年8月17日反聂五派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长是已届高龄的周培源。牛辉林在一周后接替周培源，被选为总部核心组长。由于江青听信了聂元梓校文革对牛辉林的诬告，9月1日江青批评牛辉林“（北大）‘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牛辉林到处抢抄，群众是好的”，侯汉清接替牛辉林成为总部核心组长，以避江青的风头。

宫香政同学在《论“政治倾向性”》里大段谈论牛辉林在北大的所谓的“情况”，力证牛辉林应该是个“三种人”：

1. 文革初期，当聂元梓红的发紫时，他紧跟聂元梓；
2. 当王、关、戚得势时，他投靠了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郢；
3. 当迟群、谢静宜在北大不可一世时，他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
4.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他又与邓家拉上了关系。

这样的四条政治倾向，足够把牛辉林定为“三种人”吗？我认为不能。下面我分别分析这四条“情况”给宫香政同学和诸位读者，看看牛辉林该不该被定为“三种人”。

第一条，“文革初期，当聂元梓红的发紫时，他紧跟聂元梓；”

“文革初期，聂元梓红的发紫。”这话非常正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将要无可挽回地在全国展开。通知在发布时刻是保密的，只传达到一定级别的中共党内干部。当时毛泽东在寻找一个公众事件，作为向全国人民发难的爆炸性突破口。5月25日，聂元梓在听到党内的传达后，和另外六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中共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6月1日毛泽东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行动所造成的震撼直达全国党政军和各族人民，从此中国在文革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达十年之久。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开篇劈头便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7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诸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等几乎全体成员齐聚北大，指令聂元梓组织校文革主政北大。中共领袖及党政要员，除了在背后主导运动的毛泽东，在案板上等着挨宰的刘少奇、邓小平，都来站台给聂元梓撑腰。自中共建国以来，哪一位基层干部受过中共最高领袖这样的支持？在毛泽东表态以后，北大还有谁敢对聂元梓当政说一个“不”字？

宫香政同学，我必须诚实地向你坦白，在那个时刻我也是无条件地支持聂元梓的，我们班的全体同学也是无条件地支持聂元梓的。当时我们认为，谁不支持聂元梓同志，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所以当时牛辉林组建“北大红卫兵”紧跟聂元梓，那是再正常不过了。牛后来发现聂元梓的政治品质低下，毅然和聂元梓分手，这一点是应该称赞的，不像某些人死抱着聂元梓的大腿不放，以致犯下了更多的错误和罪行。

第二条，“当王、关、戚得势时，他投靠了王、关、戚的亲信洪涛、刘郢；”

从1967年春，由于聂元梓的专横跋扈不能容人，反聂派在北大再次兴起。当反聂派尚未联合成为井冈山兵团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诸公就开始以反聂派支持王力、关锋、戚本禹为罪名，攻击反聂派和后来的井冈山兵团。某些聂元梓支持者坚持这种谬论直到今天。

从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康生、江青、陈伯达手下执掌文革运动大权，气焰熏天。7.20武汉事件以后，王关戚转

向“反对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言论和行动引起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的不满。当时全国文革有大乱失控之势，毛泽东出于以军队稳定全国的大局，将王关戚抛出来做替罪羊。王关戚的失势，不过是文革派内部分裂的结果。这显示毛泽东在打到刘邓以后，企图结束混乱收割文革果实的趋势。宫香政同学，难道你认为，王关戚在文革中的罪行和责任，比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以及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的罪行和责任更大？这样的观点符合事实吗？

从此以后，在过去的52年里，特别是最近几年，宫香政等人不断著文，攻击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牛辉林等支持了王关戚。我阅读了他们发表在《记忆》上的全部反井冈山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能证明，王关戚与井冈山的负责人有任何直接联系；井冈山的报纸为王关戚摇旗呐喊，正像当初大家支持“伟大领袖”的文革运动一样，正像新北大公社也为王关戚摇旗呐喊一样（不要说你们没有这样做，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上连篇累牍登了很多篇，你要是想知道，你可以到北大图书馆去读，我也可以给你发一个目录），正像我们两派都为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陈伯达，以及文革干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摇旗呐喊一样。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理解文革的本质而不这样做，也没有一个群众组织能不这样做而生存下去。宫香政同学找不到任何井冈山负责人与王、关、戚的直接关系的证据，因而拉出洪涛、刘郢等，等而下之的北京某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替罪羊，不觉得过于可笑吗？我们北大井冈山兵团成员，并没有因为聂元梓与蒯大富关系密切，就把聂、蒯的关系当作聂的罪行啊！

北大文革中的两派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支持过聂元梓和她掌权的校文革的，至少有如下中共中央文革派的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而支持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中共中央文革派领导人：零。聂元梓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主任、北大校文革主任。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们是什么？什么都不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一个没有后台的组织，无权无钱无势，只有一帮穷哥们儿，例如北

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等等。除了跟着“伟大领袖”糊里糊涂地为文革摇旗呐喊，就是在校内外抵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进攻，力争保全性命，不要落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控制的保守组织”（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对井冈山兵团的定性）。井冈山兵团做到了，到了文革后能讲理的时候，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周培源、牛辉林、侯汉清等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都洗清了文革中被校文革诬陷而加诸其身的罪名，周培源还当上了北大文革后的第一任校长。

第三条，“当迟群、谢静宜在北大不可一世时，他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

8341 部队在 1969 年 3 月主政北大后，负责人主要是杨德中、王连龙，迟群和谢静宜有时也来干预北大运动事务。根据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的统计，文革中北大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62 人（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的统计是 63 人），其中：

工作组统治期间（2 个月），死亡 4 人，平均每月 2 人；

校文革统治期间（2 年），死亡 23 人，平均每月 1 人；

4587 部队统治期间（7 个月），死亡 24 人，平均每月 3 人；

8341 部队统治期间（7 年），死亡 11 人，平均每月 0.13 人。

自 1966 年 7 月底，中央文革奉毛泽东的号令在北大连日召开全校大会，赶走工作组，北大大权落到毛泽东支持的聂元梓手里。大权在握的聂氏不能容纳异己，甚至把有不同意见的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哲学系左派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等赶出校文革，再加以迫害。聂元梓的校文革在校内建立俗称“牛棚”的劳改大院，关押、折磨、侮辱干部教师，建立“二组”这样的特务机构，秘密监视、收集师生员工的言行，向中央文革秘密诬告、迫害大批人员。当聂元梓的校文革不能控制局势、独占北大大权时，他们建立并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反对派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发起武装进攻，力图打垮井冈山，围困井冈山达四个月之久，直至毛泽东下令宣传队占领上层建筑，收缴大学文革的主导权。在聂元梓的校文革统治北大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23 人。

4587 部队（63 军的番号，当时军部驻石家庄）指挥的“北大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

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工宣队”或“军宣队”（端视主导者是工人还是军人）。63军在文革中与北大校文革关系极好，他们几次派军队干部来北大主持军训，支持校文革的行动。在主管宣传队统治北大7个月期间，63军与聂元梓及其下属站在同一立场，接过校文革的秘密档案，在北大整了九百多个反革命专案，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被整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反革命集团外围分子。其中著名者有：

继续迫害在校文革时期就被残酷迫害的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侯汉清、牛辉林、谢纪康、徐运朴等人及其骨干成员。校文革在武斗期间为了摧毁井冈山，在全国各地与他们家乡的当地政府和造反派组织联系，以根本不存在的罪名诬陷、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亲属，给他们造成严重身心创伤，有些亲属被迫害身亡。63军统治北大期间继续对这些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迫害，成立审查专案，诬陷他们为反革命集团成员，拉上全校大会批斗。63军做到了校文革在掌权期间没有做到的迫害井冈山负责人和骨干成员的暴行。

继续迫害从校文革的“牛棚”里被释放出来的干部和教师，造成包括翦伯赞夫妇、饶毓泰等著名学术权威的多名教师和干部被逼自杀身亡。

樊立勤，樊是生物系学生，因为反对康生被校文革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校文革于挑起3.29武斗之前，秘密抓捕关押，刑讯逼供，迫使樊承认校文革诬陷捏造的反革命罪行。樊宁死不屈，几乎丧命。63军宣传队继续关押、审讯樊，仍然未能使樊屈服。

“陈齐程刘”反革命集团，成员为化学系（陈醒迈，齐菊生）和技术物理系（程汉良，刘立民）学生及井冈山兵团骨干成员。

“桥牌俱乐部”反革命集团，成员为地球物理系教师，其成员李其琛于1968年12月8日被逼跳楼自杀身亡。他的身亡为我所亲见。

“共产青年学会”反革命集团，成员为技术物理系学生何维凌、胡定国、王彦。

63军的军人大老粗完全不理解当时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召开九大收割文革果实的战略计划，在北大大抓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打乱了毛的计划，引起毛的恼怒。毛在1969年3月派出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是毛的御林军），收缴63军的权力，改变北大宣

传队的执政方针，直接执行毛的指令。所有以上九百多个专案全部撤销，所有文件火焚销毁，所有被关押人员全部释放。至少在表面上，北大终于风平浪静了。

现在我们回到宫香政同学例举的牛辉林的第三条“情况”。这时的牛辉林，不必像在北大武斗时期，被校文革通缉、被新北大公社特工人员在家乡追捕、原“红旗飘”同伴被“下狱”、无时无刻要为人身安全担忧的恐怖状态，也不必像63军军宣队统治时期，被审讯、被逼供、被威胁。这样的状态逼死了化学系63级的井冈山普通成员李人杰，他被工宣队审查逼供威胁，在长期痛苦的挣扎后吊死在北京北郊的一个小村里。我提起他，因为我认识他，当时听说他自杀后我很痛心。8341部队进校后，牛辉林终于能够有一点安全感。作为北大文革中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之一，当8341部队受毛泽东之命解放牛辉林时，迟群和谢静宜与牛辉林谈话了解情况是应有之义。这算什么牛辉林“积极靠拢迟群、谢静宜”？在牛辉林毕业离校后，由于反井冈山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没有他们，8341部队怎么会想起牛辉林？）的关照，牛辉林又被揪回北大，审查5.16问题。当时在全国迫害几百万人的“清查5.16运动”完全是冤案，你也不是被诬陷为5.16分子的吗？你也知道，实际上全国没有一个所谓的5.16分子。

第四条，“‘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后，他又与邓家拉上了关系。”

牛辉林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在北大武斗时期被校文革抓捕关押逼供，被逼坠楼终身瘫痪）同为聂元梓校文革残酷迫害的难友，因而相识做了朋友，这是人之常情。他们做朋友，是他们的权利。下面你又说：“2011年，我在网上见到一则消息，说的是‘文革中，在北大，牛辉林是唯一正确的人’，又说‘山西省原来要把他定为三种人，是中组部开出证明信，证明牛辉林不是三种人，使他免遭一劫’。网上的消息，未必可信。”既然宫香政同学自己都说“网上的消息，未必可信，”宫同学在这里重复它不是等于是传谣吗？怎么竟然还拿来当作攻击牛辉林的证据呢？

说到这里，我要问问宫香政同学，你论证了这么一大篇“政治倾向性”，到底要说明什么？就是因为曾经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牛辉林有某种你不欣赏的“政治倾向性”，

你就盼望他是个三种人吗？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里，一个人可以有任何政治倾向，他可以与任何人交往，但是他不能非法诬陷人、伤害人、抓捕人、监禁人。最后，他不能杀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犯以上的罪行，他就是个无罪的人，也不该被整为三种人。如果他犯了，他就犯了罪，定他个三种人甚至判刑就算不得冤枉。

无庸讳言，由于文革后的社会的政治局限性，清查三种人运动冤屈了很多没有犯罪的造反派分子，或者轻纵了一些与文革后的当权派关系密切的文革中的犯罪分子，但是也处罚了很多确有罪行而没有刑事起诉的人。众所周知，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没有人犯有刑事罪行，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负责人和骨干成员有很多人犯有刑事罪行。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成员在北大文革期间、特别是在大武斗期间，犯有杀人、伤人、抓人、监禁人等罪行，这些人在文革后被起诉判刑，或被定为三种人，有什么理由觉得冤枉？

宫香政同学，如果你认为，你被定为三种人是不当惩罚，你可以对照我在前面给你例举的十项罪行，为自己辩护。你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平反。如果你承认确实犯了我在前面列举的那些罪行，你还是认真反省为好。🔒

【述 往】

## 凄风苦雨师生情

——追忆杨之岭老师

安希孟

我和北师大外语系65级辅导员杨之岭老师保持着师生友谊。杨之岭老师是上海圣玛利亚女中1951届学生。她从预科（小学五年级及六年级）到高三都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是该校1951届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她到北京师范大学上学。1955年毕业后留校做学生工作。从小学五年级（预科一）到高三，她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原著，有很好的英文素养，也积累了历史、社会、自然及人生知识。这是一种文化、知识、智慧和感情的累积，也就

是人格素质的培养和形成的过程。她对世界文明知识有深厚功底。

我们年级几度返校，居然没有见到杨老师，不能不说是憾事。辅导员，全称是政治辅导员。那年月，北师大，一所大学，从部队调来政治部主任石森，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化战斗化军事化呀。不过，那时，在杨老师身上，你看不到教条式的说教。她平易近人，丝毫不像政治工作者那样威严（我们一般对政工干部望而生畏）。杨之岭老师并没有“突出政治”。倒是我自己，连团也没入，反而政治调子还更高一些。如今，曾经获得国外博士的她，绝没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身影。她至今思维敏捷，关注世界社会，乐观面对人生，体恤底层忧患。失联多年，杨老师从别处打听到我。我们在手机上经常联系。

1965年，杨老师住在北师大工五楼四单元，雷天生是班团支部书记，正要求入党，我呢，低一个档次，正要求入团。雷天生每次去杨老师家，都让我陪同。杨老师保存了1958年大跃进北师大代表受毛泽东接见的照片。我得知1958年北师大也曾大炼钢铁。

1965年入学，我学英语比较灵活主动，48个音素，标记在书面，叫音标。我问什么叫音标，别人解释，我听不懂。其实就是给音素加标记，即[ ]符号。有几个音素我发不准，土包子嘛。如/ɜː/、/ə/，我总找对应的汉语音素，结果徒劳。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到死也不可通约。你一定要在英语里寻找“呢嘛吧吆嗨”“匹头只座株苗根”等量词，就困难。集中双元音/ɪə/、/eə/、/ʊə/，我也很吃力。就不停向朱其英请教。我估摸着他也烦了，但碍于向雷锋学习，他敢烦不敢言。

这成为我的模范先进事迹。杨之岭老师让我在年级介绍学习经验，我把当时时髦字词都用上了，诸如“生动活泼”，“积极主动”，“总想打仗”（即，总想学习）。“带着问题学”，“活学活说”，“立竿见影”，和徐寅生打乒乓球差不离。大概还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争取主动权”一类战略思想。总想发言，就是总想打仗。还有林彪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呀。

1966年春批判三家村时，我也想出点风头，“努力”写作，想有豆腐干见诸报刊。其实都是鸡蛋挑骨头无限上纲。咱跟三家村又没杀父之仇。有一次杨之岭老师认真帮我修改。



我记得文章几乎没有层次，基本上是报纸文章的摘录加上谩骂。我的写作能力就是爱显派。我寄给《北京日报》，但终因基本文字功夫和思想理论“深度”不够被退回。我那时还不能文从字顺，其实也不能完全读懂《燕山夜话》，瞎扣帽子上纲上线，墙倒众人推嘛。但《北京日报》退稿函，我却保存多年。韩佳升同学则更绝：他给《北京日报》投稿，自始至终批判的是“郑拓”。那是胡乱上纲，欲加之罪的时代。我这不是揭同学的短，是那个荒唐岁月可笑。

蹇明理于65年入学，未几被查出肝炎休学。文革中我班同学眼见人家纷纷扯帜聚义揪斗黑帮，我们无“虎”可打，只能打“苍蝇”，也揪不出什么人，于是拿周泽兰老师开刀祭旗，写大字报愤怒声讨周泽兰迫害工农子弟的滔天罪行，在文史楼台阶上让周低头认罪。后来蹇明理返校住小红楼——高干待遇。现在看来，对于肝炎病人休学的处理并不错，否则我们都难逃厄运。杨老师后来回到教育系，但70年整党时，她还回外语系毕恭毕敬地征求蹇明理的意见。好像是迫害了工农子弟似的。

批斗杨之岭老师，大概是在外语系65级三班教室里。有人在地上画一条美女蛇，让她站在蛇头圆圈内。呵呵，原来我们尊崇的老师还是美女！批判杨老师的罪行有：杨老师和教育系于陆琳（部长夫人）有联系，曾在某处给陈云打电话。似乎于陆琳的丈夫有什么问题。同学们不知打哪儿掌握如此情报，我恍惚觉着是有人盯梢。

原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于陆琳，跟随姐姐于若木（陈云夫人）到延安。文革开始，江青告诉谭厚兰：“你们学校的于陆琳是个坏女人，揪出来了没有？”谭就到军委把于揪回师大关押。师大井冈山也把她的丈夫，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押回北师大关押。杨老师因此之故曾受牵连。

大概也有人说她49年前上的是上海教会学校，单这“教会”二字，就叫我们觉着是“敌人”。我对宗教那时很陌生、隔膜，但修女，是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被丑化了。我就爱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连在一起。多么可怜而浅薄的人类文明知识。

1966年八月，杨老师后来还在外语系劳改队劳动过，这我都忘记了。群众专政，学生红卫兵监督改造。这都什么事儿呀。有一位同学眼光锐利，看到我们的杨之岭老师鞋底图案是“共”字，硬说她把“共”踩在脚下——可制鞋匠怎么会有这念头呢。

以下是杨老师的回忆和感慨：

她说，“我对文革时期喊打倒我的大部分人，并不记恨。仍记得有一次从东北来了两人找我了解当时教育系二年级的一个党员学生文革中表现，因为他们想让他当领导。我说他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文革中没什么问题。外调人员说，“听说他打倒你喊得很响”。我说，他当时不喊，大家就要打倒他了。外调人员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一直当领导直到退休。但有的人我感到他们有恶意，如外语系一位管教劳改的人，每天都在文史楼前训话骂人。他说我穿的塑料凉鞋鞋底图案是一个“工”字，我说这鞋是买的，他就喊口号，非叫我在大庭广众下脱下二只鞋，要我读出一个“共”字来。我觉得他很无知。最后他大声吼，叫我把鞋扔掉，光脚回去。我觉得受到侮辱。在我光脚回家时，6岁的大儿子蹲在楼前等我回家……这个人很阴暗。我从美国回校，在师大校园见到某某，很惊奇他怎么留校了。”

“凉鞋问题后，我主动去教育系和陈学贤说我要回教育系，因为教育系有要整我的，但也有保护我的。我从55年毕业到65年，一直在教育系。因此我回了教育系。”

文革把人搞疯狂了。杨老师历经磨难。偶然见到，她也回避。我当时很不理解。


我写了这个东西，“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后来杨老师回到教育系。在校园多次碰到杨老师，我们一点儿也没有热情和恭敬。那个斗争岁月，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撕开了个口子。

杨老师有一段温馨的回忆：“当年英一有一位张广慧，她很诚恳，朴实。文革开始，有一次我因血压低在半路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过来发现是她背我到校医院。我十分感动，但她却说“是应该的”。很快，学生也被卷进“风暴”，但在没人处，她还是和我打招呼。2004年我从美国退休回国到厦门去师大实验小学海沧分校介绍美国小学教育时，听说张广慧也在那里教英文。我们再次相见，十分激动。我再次当众讲了她背我去医院的感

人事迹。后来知道她因病去世，我还打电话给她丈夫表示哀悼。文革前师生关系是亲密的、互相信任的。文革宣传成了敌对的……”

1980年1月，杨老师受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邀请并出资，由教育部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从事教育考察和研究。她的业绩引起的注意，被美国两个国际性教育组织 PDK（Phi Delta Kappa）和 ICET（International Council Education For Teaching）接受为终身荣誉会员。她后来在美国获得教育哲学博士学位，时年49岁。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派美国留学人员中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人。

在太原市西山矿务局任教的马锡恒和张广慧说，80年代，杨老师应太原市教育局邀请来并讲学，他们二位去看过杨老师。他们说是因杨老师给教育局嘱咐，他们二人才入了党，马锡恒还被提拔成西铭中学副校级干部。虽然这说法并不准确，但他们心存感恩之心。

【述往】

## 我与北师大

### ——校内校外的混战

蒋世信

“八一八”之后，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支持、高校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师大筹委会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没几天、谭厚兰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井冈山红卫兵团》，开始仅有一百多人，由于有林杰、关锋的幕后支持，筹委会的红卫兵们纷纷倒戈易帜，加入到谭的《毛泽东思想井冈山红卫兵团》，很快、谭的队伍发展壮大，“革命造反”走向社会走向全国。

1966年11月，谭厚兰在康生、陈伯达以及戚本禹、林杰的授意下，率领师大红卫兵200多人，开往山东曲阜造反，砸烂“孔家店”，捣毁孔府、孔庙、孔林。尤其数二（1）班的王瑞龙，1965年社教入党，66年文革当上谭厚兰井冈山红卫兵团作战部副部长（部长

是物理系的周耀文），带领师大与当地的红卫兵首当其冲、疯狂地砸碎立有千年的孔碑，挖了孔子坟，烧毁古匾古籍古字画，砍伐五千多株古松柏，盗掘二千多座坟墓，……，这些活动都有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片，作为辉煌战果曾在师大放映（黑白片大约 50 分钟），我曾在师大北饭厅观看过。昔日的辉煌战果、今日的历史罪证，纪录片将谭厚兰们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死死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七零年抓“五一六”，王瑞龙被军、工宣队隔离审查。一天早晨，他从工五楼的四层楼南窗户跳下，由于屁股着地、加之夜里刚刚下过小雨地面松软，仅是砸了个屁股印（我也是好奇、当天上午特意去工五楼的南墙下面看了看，一点儿不差——屁股印很鲜明），王没事人似的拍拍屁股走了，工宣队知道后、马上派人带他去医院检查：尾椎有点儿轻微的压缩性骨折。不久，在东操场召开的全校“宽严大会”上，王瑞龙作为“从严”典型当场逮捕，主要是抗拒运动及捣毁孔庙孔府孔林的罪行，被判刑 8 年。刑满释放、他回老家顺义一中当了数学教师，听说还入了党，在清理“三种人”时、再次被开除党籍，成为代课教师，再后来是离开教师队伍还是经商就不清楚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善于钻营、能说会道、见机行事、活动能量不小。

1967 年 3 月谭厚兰们按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七月与其他高校红卫兵组织“反帝反修联络站”、八月和外院红卫兵等“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参加誓死揪出刘少奇的“揪刘火线”。记得我们还到府右街观看过，当时中南海的西墙、整个府右街两侧、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一个接一个满满地全是高校及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安营扎寨，处处悬挂着校旗与印有红卫兵组织名称的彩旗，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播放着语录歌，声嘶力竭地呼号着：“揪出刘少奇、打倒刘少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真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大有“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架势，搅得周围居民无法入眠、苦不堪言。直到八月五号公布毛主席一年前即 66 年 8 月 5 日在中南海贴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才算了结，因为毛主席回京，岂敢干扰主席休息，整整一个月、“揪刘火线”的闹剧终于偃旗息鼓、府右街恢复了往日


的“平静”。

“七二〇”武汉事件，在全国影响非同小可，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社会出现动荡，引起毛主席和林彪的警觉与不满，毛说：“还我长城”，“王、关、戚破坏文革不是好人。”很快，王力、关锋、戚本禹及林杰等陆续倒台，这对谭厚兰是极大的打击。

九月七日，师大发生了倒谭事件，有个什么“专政委员会”还将谭厚兰软禁，谭的革委会迅速崩溃瓦解。对此，考虑全国可能会出现连锁反应，中央文革连发三道指令：谭厚兰是革命的，革委会及井冈山红卫兵是革命组织，“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立即解散。

指令像免死牌又像护身符，保护了谭本人也稳住了谭派的阵脚。那些倒戈的谭厚兰“杆们”又纷纷掉头、痛哭流涕向谭认错效忠，变脸之快令人作呕。

但是，与谭观点相左的师大造反兵团正式宣布恢复活动，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参加了师大造反兵团，并跟随兵团在68年3月下旬参加“倒谢”，以《今胜昔》战斗队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倒谢”一周而遭失败，早春三月寒风料峭，师大校园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凄凉与萧条。不知为什么，北京市委下达命令：“对参与‘倒谢’的人，一律不予追究。”三月底中央宣布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指出他们是倒谢的总后台，这哪跟哪啊？真把我们搞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四月初，数学系一年级的四个同学到三里河踏青春游，由于好奇，不知深浅地竟然跳上钓鱼台的围墙往里瞧，结果被围墙里的解放军用枪逼住，带到传达室查问：是师大的学生，感觉没什么问题就给放了。可是，半夜却来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卫戍区士兵，临时戒严西西楼（我们的宿舍）、又把其中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范光州同学抓捕，原来此事惊动了江青，江说：“杨、余、傅刚倒台，就有趴钓鱼台墙头的，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认真查处。”就这样，范光州在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待了半年。此事深深地告诫了我：不该吃的别吃，不该看的别看，不该想的别想，不该做的别做，好奇惹祸啊！

【述往】

##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 —— 血腥武斗（十八）

陆伟国

#### 攻打红楼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此时，人大校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进校时敲锣打鼓大不一样，5月10日，驻校“军训团”面对失控局面无能为力，突然撤走。应该说，这是高层的一个重大失策。两派之间顿时失去一个第三方的制衡因素，都急于要抢夺“制高点”，扩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儿讲的“制高点”，不只是个地理概念。加上江青又曾一再发出“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当天，对方“新人大公社”占据了林园9楼。那是栋教工家属楼。有11户“三红”教师的家被抄和赶走。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在这第二天，5月11日，由“三红”攻打红楼。此红楼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学校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新教学大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新教学大楼现在叫公共教学二楼），基本上是东西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隔着一块空地的红楼。红楼有并排的三栋，主要攻击是最前面的红一楼。行动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

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坠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阵的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

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从红楼到“三红”总部大楼（新教学楼）的几百米路上，布满了点点血滴，接连不断，可见攻防之激烈。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范围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容易被分割包围。最后，双方停火，攻方暂时后退，让守方撤出，再由“三红”接管。“三红”由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相互依托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扔石头。我的体质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就算是扔，恐怕连墙也够不着，别上去丢人现眼了。

### “夜袭兵工厂”

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既然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的窗户只留半扇，另半扇就用板挡上钉死。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侧身而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为了便于自卫防身，防备对方冲进来突袭抓人，我们男生几乎每人都配备了一根长矛。平常下楼出去，哪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随身扛着。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根，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这些长矛和其它一些简易武器，上哪儿去制作？学校的西面有个1965年初刚建成的校办工厂，那是一个小型机械厂，里面有一些机床、钢条，被对方所占据，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这可是涉及到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因素，不可不“为之一战”。

5月15日，“三红”这边向校办工厂发起突然袭击。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原本是想以极短时间迅速抢夺一些钢条、简单工具过来，尽量不发生对抗。之所以放在晚上，也是以为对方的守卫人员会少一些，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小一些。结果，真的冲进去时，还是与厂里对方的留守人员发生冲突，引来了对方人员的增援。双方在厂门口和围墙处，用铁棍木棒大打了一番。前后约四十分钟，而且还是发生了惨痛的伤亡事件。对方中文系的王锡中同学不幸身亡。他是死在房顶上，很可能是受伤后，躲避到屋顶，而永远地倒在那里。

我们是天亮后知道这事的。事后还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多辛酸泪啊。

### “捣毁野猪林”

武斗的车轮越转越快。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就放手，“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倒了。

宿舍里有了长矛，还出了个小意外。没等对方来，就差点伤了自己人。一天，在我们宿舍里，有个同学闲极无聊，想试试那东西管不管用，拿起来就往墙上捅了上去。谁知，那墙不是砖墙，而是两层带缝的木条，中间是空的，有一块砖样子的间隔，外面用泥巴和石灰糊上。长矛捅上去，那墙哪里经得起，“哗”的一声，掉下一大面泥巴、石



灰，就穿了过去。引得旁边宿舍的那位同学生气了（他外校的女友正好也在，可能就更生气了），过来在我们门外，二话不说，就把门上面气窗的玻璃给砸了。我们知道有点理亏，悄悄的，都没出声。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过路的人。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

5月17日，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烂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武斗队排成一排，在外面警戒保护。大道上，上百人在来回奔跑，抱的、扛的、提的，忙得不亦乐乎。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被称之为“捣毁野猪林”。由于双方没有发生直接冲突，这一天在现场的同学们都是兴冲冲的。这场没有对手的行动，就像是一堂课外活动。

但事情又很快就到了最血淋淋的一幕。

## 武斗队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武斗，各群众组织都成立了专门的武斗队，装备也在不断升级。两派斗争到了真正意义上你死我活的地步。

“三红”也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专门“武斗队”。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

用上，剪成一片片的铠甲。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

这支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哈，哈”地喊着刺杀声。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面罩上的铁丝网，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多危险哪！要是再捅进去一点点呢？到真的拼杀时，那会是什么结果啊？不过，他们的军事素质看来很好。出了这样的事，其他人就像没发生一样，依旧在原地双双对刺。只是领队的过来看一下，也没多说什么，叫他下去休息。那位受伤的同学，也很坚强，连头盔也没摘。那时的青年学生，都被“革命”熏陶到了什么样子。

出于好奇，我也曾穿上这身装束试试。感觉太异样了。重，还是其次。就是太别扭，太拘束，手脚无法施展，浑身上下都动弹不了。做什么动作都完全变形，力度和方向没法把握。尽管曾有过多次的军训和体育课，作为那时的大学生，对刺杀动作已很熟练，但这时好像我已经不是我，完全是被机器支配着，就像一根拽在别人手里、任由他人挥动的棍棒。

透过面前的铁丝罩向外看去，别的人，也就都像是一个个要消灭、要杀戮的对象，是一个个要啖其肉、噬其血的猎物。头脑在发热，热血在翻腾，浑身在膨胀，手脚几乎都不听指挥了，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杀人，杀人”的字样，就想要刺杀出去。我从心里感到可怕，不只是怕真要上了武斗场，这身装束将成为别人刺杀的对象。更怕的是，在这身装束下，人已经被彻底地扭曲了，已经不再是有正常人性的人，而是一只杀人与被杀的野兽。“革命”的意义，“造反”的意义，此时都露出了本意。

血腥之剑一旦拔出，就像狂暴的野兽横冲直撞，想挡也挡不住、想停也停不下了，局面很快就失去控制。离“捣毁野猪林”仅仅过了几天，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无法扑灭的烈焰。

这场武斗，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修筑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拉铁丝网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开始是小摩擦，当时对方在现场有装备较好的几个一线武斗队员，有点占了上风。这方人员怕吃亏，就连忙要求总部增援，“三红”的武斗队很快就开了过去，最终导致了双方“武斗队”面对面的拼杀。

那天，下午，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我在楼下，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跟往常一样。突然，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西面打起来了！西面打起来了！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不知道啊？”“怎么啦？”我们问。“打起来了！都打起来了！”他使劲地嚷着，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哗啦”一声，“武斗队”从总部大楼打开西侧大门出发了。我们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我们想跟着去，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们跟着去，只能给他们添麻烦、增加负担，所以没有坚持。

### 血战操场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当时的新图书馆，是“新人大”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叫图书馆东馆）。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

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随车的，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同学，听说是个教授的女儿，一身黑衣，手持一把长剑，真称得上是英姿飒爽。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叫陈江，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

【资料】

## 孙蓬一 1967年4月12日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

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战友们，新北大公社社员同志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我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我们年轻的新北大红色政权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考验！我们已经投入一场新的战斗！（群情激昂，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昨天，今天，从我们新北大上上下下，一切革命同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的气概就可以给企图搞垮新北大那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热烈鼓掌，呼口号）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做着永远不可实现的美梦的人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北京大学从来有像这样斗志昂扬吗？！（热烈鼓掌）我们要感谢一些人，你们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克服“温”字老毛病的一个良好条件。（长时间热烈鼓掌）我们今天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光荣传统的发扬和光大，就是“五·二五”“六·一”“六·一八”“七·一九”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发扬和光大！（长时间热烈鼓掌）如果有人怀疑北京大学有一支过得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伍，那么，我们欢迎他们参加我们的大会，听听我们战斗的声音！（热烈鼓掌）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很高兴的；但是，也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高兴。据说像樊立勤之流他们也在窃窃作喜，他们在蠢蠢欲动。同志们，我们能允许他们轻举妄动吗？

（不能！打倒樊立勤！）有一些人，自称是响当当的过得硬的左派，他们不和我们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却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称的那种所谓的造反派，也就是被我们所击退的曾经控制我校井冈山、红联军的一小撮反动头头身上。难道说，你跟我们的敌对势力站在一起，我们就没有理由问一问你：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对！鼓掌）有的人

讲，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对别的单位支持不够，从我们方面来检查，原则上应该接受这样一个批评，因为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但我们做得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从这个角度根本否定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其他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援，如果说不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你们未免太健忘了！（热烈鼓掌）我们并不想夸耀我们北大什么功绩，但是，既然有人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我们也不妨简单地说他两句。

就以地质东方红为例，他们在最困难时期，我们北京大学的革命派支援了他们。从聂元梓同志开始到我们广大的同志，支援了他们。我们做得很不够，但那是我们努力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心是和那个时候的地质东方红革命造反派连在一起的。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支持哪一派呢？就是他们那一小撮头目以朱成昭为首的支持我们北大的井冈山，北大的红联军。井冈山为什么能够加入三司呢，主要的责任就在他们身上。我们说，他们不仅没有支持我们的斗争，不仅没有帮我们的忙，而且是帮了我们敌人的忙，帮了我们对手的忙。这些问题，过去我们都不愿意讲，甚至一直到中央关于北京大学这一场长达几个月之久的阶级大搏斗，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的时候，他们迟迟不肯把臭名远扬的一小撮反动头头所控制的井冈山开除出三司去。以致最后经我们坚决的斗争，经中央文革的批评，他们才不得已做出了一个开除的决定。

朱成昭名义上现在是下台了，朱成昭的势力还在。我们有理由怀疑地质学院东方红，他们究竟在肃清朱成昭的影响方面做得怎么样？（对！掌声）我们绝不想干涉兄弟单位内部的事情，但是你们既然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一些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据我们所知，现在正充当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充当了一个反我新北大红色革命政权的打手的急先锋们就是朱成昭的势力，朱成昭的残余的力量。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如果说，在昨天我们有些事情还看不清楚，那么到了今天，那一小撮人的心是路人皆

知的了。因为马路上都写了大字标语了，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的目的已经清清楚楚了！（对！）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民族宫事件本来是微不足道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对！鼓掌）目的是他们背后的那些人要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当着党中央提出来，现在是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当着党中央提出：“小分裂犯大错误，大分裂犯罪”的时候，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独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就不惜来破坏大联合。他们的目的就是：一、搞垮红代会，独揽红代会的大权；二、搞垮即将诞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高呼口号）他们已经公开提出口号来了，他们的矛头，不仅仅是指向聂元梓，也不仅仅指向我们新北大的革命同志，完全有理由可讲，他们的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决不是给他们引伸，更不是给他们扣帽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心理已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要换所谓“老三司”，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我们不信任你，到底是谁保你的驾”，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全场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唱语录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内部矛盾的问题。

目前的这场斗争，既然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因此，什么“委曲求全”呀，什么“忍辱负重”呀，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呼口号）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做，跟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否一致”（一致！）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不一致的。我们所以要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而今天，当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

政权的时候，有人企图捣乱破坏，这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就是大方向！（鼓掌）

目前，从北京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而且越来越好；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帮黑帮爪牙，他们企图翻案，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

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便不择手段，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要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当他们跟别人辩论，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便拿出所谓的王牌，说：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支持了你，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对！）

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股势力的代表，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对！）

关于这几个组织的情况，我这里简单地说几句：比如说，教育部的延安公社，他们里面查明了的叛徒，起码有五个，（高呼口号：打倒叛徒！）有的叛徒是非常恶劣的。例如卢正义，根据现在的材料，表明他不仅仅是个叛徒，而且可能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一个特务；还有一个东北人，国民党攻占沈阳以后，她叛变了共产党，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当了官太太。1949年，她又混进了北京，混进了党内，现在也成了延安公社的骨干。

还有一个女的，她的丈夫过去在河南做地委书记的时候，叛变了革命，出卖了革命同



志，聂元梓同志的一个侄子，当时刚刚入党，只有十六岁，就被这个叛徒活活打死了。这是她丈夫干的，而这个女的跟她丈夫是一起的，所以她改名换姓。现在她很恶毒地咒骂聂元梓同志，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不是什么个人对个人，而是阶级对阶级！（对！）在这些叛徒内流传着一个非常非常卑鄙哲学，流传着一个什么论调呢“越是叛徒越是左派”。同志们，你们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混蛋啊？（是！）他们这种卑鄙无耻的说法遭到了延安公社要革命的同志激烈的反对，而且有很多同志公开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可耻的理论。（高呼口号：打倒叛徒！）

这样一帮家伙，他们过去是“陶保派”，就是陶铸所保的那一派，也是“保陶派”。可是，这一伙，由于他们是政治投机商，他们靠闻出市场行情的味道，经常来一些出人意的手段，这样使他们在陶铸在的时候，是拥护陶铸的分子，等陶铸有问题的时候，摇身一变成为反陶的英雄，这些人是所谓的永久牌的高手。在我们看来他们是有奶便是娘的投机商（对！！长时间的鼓掌）就是这一伙得到了一些人死心塌地的支持。我们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这帮家伙，做着美梦，他们做了夺权的准备，他们有一个升官图，这个升官图我们已经拿到了。他们做着非常如意的美梦，就是说在夺权之后，高教部教育部的第一把交椅就让卢正义来坐。我们打倒一个蒋南翔，能换上一个卢正义吗？（不能！！）我们绝对不能。

打倒卢正义我们有详细的资料，我们有调查报告，我们可以向全市公布。还有一个，就是学部红卫兵联队吴传启们一帮人，吴传启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他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左派，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值得大加审查的人。为什么呢？吴传启在抗战时期当过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军统特务报纸的编辑。抗战胜利后，吴传启当国民党的“大刚报”的编辑、记者，为国民党服务。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同志揭发，吴传启的社会神通广大，当你的东西丢了以后，在两天之内就可以给你找回来。就是这个吴传启过去跟人合作也写过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可是我们说，他是不是一个左派，不能仅仅以此为标准。文章写的漂亮，但那是演戏，是做给人看的。有的人说中央文革支持吴传启，我们没

有这么一个消息。别的方面，我们看他在文革中干了什么？我们仅仅看他对反对他们的人采取什么态度。有部分群众反对硬把潘梓年作为当然的文革成员，而这部分群众就变成反对派。他们是怎样对待这部分反对派的呢？原来的对立面叫红卫兵总队，几乎所有红卫兵总队的办公室宿舍都被吴传启、潘梓年所控制的红卫兵联队所砸、抄，所洗劫，他们每闯进一个地方，就布置岗哨，割断电线，拿斧子、锤子砸办公室、档案柜，翻箱倒柜，动手行凶打人。

不完全统计，自20号以来，学部红卫兵总队多名群众，有九十四人被打，几十个人被搜？五十人以上被抄家，四十五人被非法斗争？和绑架；有116个办公室、133个办公桌、41个保险柜和文件柜被砸被抄，被抢走粮票60斤，布票37.5尺，人民币200元和大量的私人信件和笔记，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毛主席照片。同志们，难道说坚决贯彻打砸抢，靠打砸抢起家的人，我们能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坚定不移的左派吗。另外一个单位到处发表他们的文章，到处安排他们的势力，这种现象不正常，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对！！）

有的人在外面甚至造谣讲，原学部的周景芳是中央文革成员，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事实上周景芳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面造成一个假象。我拿我们的邻居人民大学来说，好像反对肖前就是反对吴传启，反对吴传启就像犯了弥天大罪一样。我今天就要公开表示，我们就是反对一下吴传启（热烈鼓掌）。再就是红色联络站，以洪涛、刘郢为首的一小撮人在115档案事件中，就抢走了国家机密档案90多箱，把政协的档案都全部抢走了，里面有很多国外的军事机密的资料情报。抢了以后，分到个人手中，现在有许多重要档案都散失了。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证明洪涛他们与已经被宣布为反动组织的“湘江风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与宣布为反动组织的“红旗军”也有秘密联系。

但是，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洪涛一小撮抢劫了国家大量机密的档案，在他们窃取国家机密档案的时候，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负责，

制止了他们，把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而结果怎么样呢？抢档案的人成了革命派，而制止抢档案的人却成了反革命。红卫兵总部的郑仲兵同志被关到监狱十五天。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绝对不能做奴隶主义，绝对不能盲从。（对！！）

就是这一帮人，他们勾结在一起，凑成了现在北京市存在的最大的下山摘桃派。他们妄想通过一些阴谋手段，来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我们要告诉这些先生们，我们这次文化革命一定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决不允许换汤不换药！正是由于这样，所以北京大学过去尽管很“温”，也为他们所不容。因为，我们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正派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变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一个障碍，一个眼中钉，所以他们来给我们制造矛盾，挑起斗争。现在，斗争既然由你挑起，这场斗争将怎样进行，就不以你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了！（对！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外面造成一种虚假的现象，似乎北大很孤立，似乎很多单位在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假象！我们相信，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朋友遍天下，与我们有分歧的同志，包括签了名××单位的很多同志也是支持我们的。所以，在我们分析当前北京市文化革命形势时，要看到这一点，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在某个问题上，跟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他们还是我们的战友，这里，我再一次表示我的看法，像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应当和他们一起战斗！（鼓掌，呼口号）我们完全相信，尽管目前存在着某些分歧，存在着某些误会，但是大家将会很快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将把我们几个单位紧密联系在一起！（鼓掌）


当前的情况是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委曲求全呢，还是针锋相对呢？

（针锋相对！）对！只有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团结亡。（对！鼓掌）（高声齐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么，我们斗争的策略是什么呢？斗争策略，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应该是退避三舍，不打第一枪；“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鼓掌）我们这决不是感情冲动，决不是闹个人意气，这决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小团体，而是为了整个阶

级，为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既然是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完全应该拿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风暴，前进！（高呼口号）

今天到会的可能有兄弟单位的战友和同志们，我们公开地讲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有意见，欢迎你们批评。有些具体情况，由于我们出于种种考虑，其中还有“温”字在作怪，没有及时地向同志们讲，我们知道的情况，以后将陆续地通过广播台，通过大字报，宣传品，发给同学们，把情况交给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我们深信，我们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是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会从事实当中，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南，从其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绝不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盲目地服从什么“总部意图”。

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们学校肆意破坏以后，在我们学校开了一个所谓的控诉会，斗争了我们的同学，用了比对黑帮、对敌人更加残忍更加凶恶的手段残酷地迫害我们的同学，大家可以从这些事实中进一步看看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他们在我校捣乱后，到处造谣，拿出他们老的本领，倒打一耙，他们跑到我们的家里，打了我们的人，破坏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而说我们是什么犯了罪，世上哪有这个道理，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对！！鼓掌）


今天据说在地院聚集了一万多人开了所谓“誓师大会”，继续发动和挑动对新北大的进攻，我们怕不怕？（不怕！！）对！在我们无产阶级造反派面前就没有一个“怕”字，我们可以奉告这样一些人们，的确，从我们这方面来讲，我们一天也不准备打，一次也不准备打，但是你们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坚决地奉陪到底！

原文载 1967 年 4 月 13 日《新北大》

## 【读者来信】

## 1. 向南雷：专业刊物应该有专业性


贵刊是研究文革的专业刊物，专业刊物就得有个专业的样。你不能像科普杂志似的给大家讲热胀冷缩，杠杆原理和醋是怎么变酸的。我的意思是，贵刊不宜刊载那些人人皆知的历史秘辛、高层逸事（除非你有新的解释，能从这里陈糠烂谷子里挖掘发出新的观点），贵刊的作者也不必把大家耳熟能详的文件、最高指示引用大段大段地引用。

另外，不管什么文章都要简洁明了，可是贵刊发的文章很擅长重复，同样的意思换个词反复说。我知道写文章的多是理工科，知道作者的年纪都已经六七十岁了。老人容易唠叨，唯恐意思说不清楚。这就需要编辑下功夫删剪，不能原稿照搬。

## 2. 皮皮侠：红色文化与时俱进

俺们读贵刊N有余年，略有感悟，特冒昧进言：贵刊的内容分成地方蚊哥、高校闻阁和瘟歌散辑三大块。从去年起，后一块貌似投到了红色文化的麾下，扩军备战，占了瘟歌散辑的一半江山。散辑原来尽发表一些评论、怀念亲友、回忆往事、序跋、读书一类的文章，这回拿出一半疆域划给红色文化，以表示与时俱进，实在无可厚非。说实话，对俺们这样的“瘟二代”来说，红色文化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咋说呢，俺们从早到晚都泡在这文化里，当然想知道这文化有没有多环芳烃、黄曲霉素、二甲基亚硝酸胺这类致癌物。没有固然好，有了，就得预防。问题是，贵刊光说这有毒那有毒，却不告诉俺们怎么消毒。剩菜可以扔了，花生霉了可以不吃，烧烤腌肉也可以咽着口水，咬牙拒绝。可文化呢？歌德效忠的歌你能不听吗？忠君输诚的剧你能不看吗？更麻烦的是，好的坏的混在一起，俺们根本分不出来。

所以，俺们赞成贵刊说的，先做文化清理，从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说起。



#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http://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 二、定制服务：

###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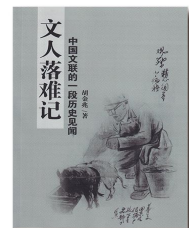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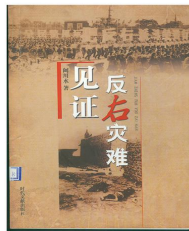
##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http://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本刊聲明】

##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